

## 目 錄

第 1 章	緒論 沈淪中的高職？	2
1.1.	研究動機	2
1.2.	問題意識	4
1.3.	文獻回顧	6
第 2 章	我國職業教育政策之演變	10
第 3 章	研究方法	16
3.1.	質性研究方法	16
3.2.	研究對象	17
3.3.	訪問問題	22
第 4 章	田野資料初步分析	24
4.1.	第一世代田野調查初步分析	24
4.2.	第二世代調查基本分析	35
4.3.	第一第二世代差異初步比較	47
第 5 章	高職生技能之社會地位	52
5.1.	所學技能不足	52
5.2.	社會上對技術的重視	60
5.3.	高職生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價值」	62
第 6 章	結論	68
6.1.	研究結果	68
6.2.	高職教育之我見	70
6.3.	研究中的其他發現	71
參考書目		73

## 表 格 目 錄

表一：我國技職教育政策之演變 .....	13
表二 第一世代受訪者基本資料 .....	20
表三：第二世代受訪者基本資料 .....	21
表四：高職生受訪者訪談大綱 .....	23
表五：相關人士訪談大綱 .....	23
表六：第一第二世代田野初步分析對照表 .....	47
表七：1955-1990 學生佔總人口千分比：按各級學校分 .....	65

# 第1章 緒論 沈淪中的高職？

「我念高職的原因很簡單，就是為了一張文憑，就這麼簡單，就業的話，是靠技術，不是靠文憑的，我就是為了那張文憑。我們沒有真的學到什麼。如果不是要拿那張文憑，念高職實在是浪費生命，像學英文數學，根本就用不到，電子學也是差不多，沒興趣，要職訓那種樣子學才比較有意義。」（洪家昌）

## 1.1. 研究動機

經過十年教改之後，全國教育改革之檢討與改進會議於去年底（2001年12月15、16兩天）召開，會中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建議廢除高職教育。他表示，高中與高職的比例雖然由三比七變成現在的五比五<sup>1</sup>，但是高中的數目仍然不夠，只有廣開高中之門，才能抒解升學壓力。因此他建議，應該將現行的高職盡快轉化成綜合高中的形式，以暢通升學管道<sup>2</sup>。也就是現行高職階段的職業教育可保留至大學階段的職業教育，高中生則修習通識的基礎學識，以採取延後分流<sup>3</sup>的做法，把職業教育的部分留待大學階段再施行。

這種說法立即在全國各界引起廣泛的討論，其中清華大學社會所吳泉源教授隨後發表「一個看不見『技術』的社會」一文，文中提及台灣在國際分工中「製造王國」的地位，所憑藉的是不斷精通產品製造所需的技術能力，以「成熟的加工技術、最具競爭力的製程、完整的代工體系以及相對低廉的勞動力」維持在國際市場上的優勢。然而不論是產官學界或是社會大眾，仍是以貶抑的態度面對台灣的技術發展，認為台灣的經濟奇蹟是「copy」來的；另一方面則是同時強調升學、文憑主義，只有進入大學等研究單位，才是技術升級的關鍵。此種對技術的看法，成為現今有人輕忽高職、提議廢除高職的原因之一<sup>4</sup>。

其他仍有許多針對此議題的討論，例如有高職教師表示：高職生畢業之後擔任各產業的基礎勞動力，是台灣發展的基石，雖然台灣不以研發見長，但仍

---

<sup>1</sup> 這裡所指的是高中與高職入學人數的比例，詳見第二章。

<sup>2</sup> <http://ctnews.yam.com.tw/realtime/200112/16/116851.html>，中時蕃薯藤電子報，2001/12/16；  
<http://ctnews.yam.com.tw/news/200112/18/215706.html>，中時蕃薯藤電子報，2001/12/18。

<sup>3</sup> 「分流」意指國中畢業後，要繼續升學者必須面臨進入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tion）或職業教育的選擇。

<sup>4</sup> <http://ctnews.yam.com.tw/news/200112/18/215641.html>，中時蕃薯藤電子報 2001/12/18。

為研發之後最佳的量產中心。研發人員固然重要，基礎勞動力仍不可或缺，許多技術性的工作，也不是高學歷者所能或者願意從事的<sup>5</sup>。高職雖有現實上的缺點，但已在改進當中，高職的總量也已經減少。而相對於就讀高中繁重的課業壓力，高職提供的是以「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方式，讓另一種學生可以有得到成就的機會<sup>6</sup>。也有高職畢業生表示，自己很喜歡在高職階段，一邊動腦一邊動手的實習課<sup>7</sup>。

當時的教育部長曾志朗，則是認為高職對產業界仍有需要，但是規模仍應逐漸縮小<sup>8</sup>。前教育部長郭為藩認為應該調整學制以因應社會脈動，曾任技職司長的前教育部長楊朝祥則認為如果要廢除高職，應該是配合十二年國教的一個環節，在此之前應該保留。高雄市教育局長曾憲政認為這是「重北輕南」現象的再次顯現，因為高職教育對南部學生與社會仍很重要，不能以北部觀點輕易廢除<sup>9</sup>。

事實上近來關於高職變革的討論並非從李遠哲的發言開始，1995年成立的「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針對台灣的教育進行許多研究與討論，其中也包含了職業教育的部分，並針對高職的改革方向提出建議<sup>10</sup>。教改會雖然沒有得出廢除高職的結論，但是從相關的研究報告裡，的確發現當今高職教育頗值得檢討。

從上述爭論中可以看出，高職經常被視為經濟發展的工具之一，高職的價值，主要也和是否能配合產業發展有關，就這個角度而言，對於技術的傳授，以及所發生的作用，是相當重要的一個部分。對於這許多不同的看法，不禁令人好奇究竟現實狀況為何？另外在諸多關於高職的研究當中，鮮少看到曾就讀高職者的經驗，更不用說是在吳泉源教授所提到「技術能力<sup>11</sup>」，已經是大約在1960、7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之時，當時的高職生經驗，也幾乎從未有人提到過。基於這些原因，令人想到：如果對照他／她們的經驗，會有什麼結果產生？

---

<sup>5</sup> [http://www.maillist.com.tw/maillist/maillist\\_browse.cgi?show\\_old\\_epaper=s41317&filename=20011218161705.html](http://www.maillist.com.tw/maillist/maillist_browse.cgi?show_old_epaper=s41317&filename=20011218161705.html)，台北市教師會電子日報，2001/12/18。

<sup>6</sup> 同上註。

<sup>7</sup> <http://bbs.nsysu.edu.tw/txtVersion/boards/high-school/M.1011496942.A.html>，2002/1/20。

<sup>8</sup> [http://www.gostudy.com.tw/asp/show\\_news.asp?20011225103544506](http://www.gostudy.com.tw/asp/show_news.asp?20011225103544506)，2001/12/26。

<sup>9</sup> <http://61.222.52.195/news/2001/12/17/2001-1217et05.html>，東森新聞報，2001/12/16。

<sup>10</sup> 請參閱本章第二節、文獻回顧。

<sup>11</sup> 同註3。

## 1.2. 問題意識

一般人對高職畢業生所從事工作的印象，可以從 2001 年 12 月 17 日監察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前往教育部視察時的言論中略見端倪：

台灣基層技術人員以高職層次為主，中級技術人員以專科與二技為主，高級技術人員以大學畢業為主<sup>12</sup>。

然而，高職曾經是培養台灣產業技術人才的主要教育機構，根據一般印象以及五六十歲年齡的長輩言談之中可以發現，在數十年前，能唸到高職可說是一件不簡單的事，高職畢業生在當時並不多見，可算是當時的「知識份子」、「讀冊人」，而憑著高職學歷也能找到不錯的工作。反觀現今的高職教育，雖然仍是本著培養技術人才的宗旨<sup>13</sup>，但似乎在升學主義掛帥下，變成只有大學畢業，才能稱得上是「知識份子」，相對於升大學較為容易的普通高中受到一般家長、學生的青睞，高職似乎成了學生不得已的選擇。在工廠裡，過去受過技職訓練的高職畢業生，可能直接擔任基層管理職位的工作，現在則只能擔任基層作業員，至於管理人員，常由專科甚至象徵「知識份子」的大學生才得以擔任。

從國家的角度來看，在 1976 年以前，職業教育政策是由經建部門所決定，再交由教育部門執行，意即職業教育直接被視為經濟發展政策的一部份。之後雖然逐漸回歸教育部主掌職業教育政策<sup>14</sup>，教育部也嘗試將職業教育擺脫人力規劃的色彩，但關於職業教育的相關討論裡，仍然相當重視職業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連。

在上述對高職存在價值的討論中，部分從配合經濟發展的角度看待高職的價值，由此衍生出視高職為人力資源規劃的一個環節，然而同一個想法得到的卻是不同結論：贊成廢除的認為若要技術升級，高職教育不需要；反對廢除的認為，技術能力有其需要，因此高職有其一定價值。這是思考高職價值的一個

---

<sup>12</sup> <http://tw.news.yahoo.com/2001/12/18/society/ctnews/2931538.html>，中時電子報，2001/12/18。另可參閱馬道行（1982），「我國技術職業教育發展問題與改革動向」，世界技術職業教育改革動向，p. 271-294。文中介紹到科技人力層次結構改變與工作領域轉移，以及社會整體人力結構劃分方式。

<sup>13</sup> 職業教育法，職業學校「以教授青年職業智能，培養職業道德，養成健全之基層技術人員為宗旨」。

<sup>14</sup> 以高中、高職就學人數比例而言，政策上對於此比例的改變，一向由經建部門提出，首次由教育部門提出的比例變動，是 1995 年教育部在「教育報告書」所提的 5：5 的比例（謝小苓等，1996：16）。

方向。另一個方向，則是從教育本質的問題<sup>15</sup>這個方向思考現行的高職教育，對個人發展上，造成何種影響：在國中畢業進入高中階段進行分流是否適當？對於個人性向尚未明確的人而言，會不會太早？職業教育是不是造成階級的複製？此外，如果說教育的本質是人格養成、性向潛能開發，職業教育是不是變成培養「人力工具」的手段<sup>16</sup>？也就是說，目前一般文獻多從人力資源、教育理論、課程內容以及經濟成長需要等層面探討高職價值。

然而，不論從哪種觀點出發，也不論贊不贊成，都不會否認「培養技術人才」是高職重要的功能之一。理想上，一個高職畢業生，經過三年的高職教育之後，應該是具備一定的技術能力，這個技術能力，可以讓高職畢業生有一定的本錢，讓他／她在求職的時候具有某種程度的優勢，也可以讓他／她不需要經過長時間的訓練（相較於非高職畢業生），就能在工作崗位勝任愉快。因此，在討論高職相關問題時，我們需要問到，高職是不是做到了這樣的事情，高職是不是真的培養高職生「一技之長」？高職是不是幫助高職生順利進入職場？「技術」在這過程當中，如何發揮作用？凡此種種，是討論高職相關問題時，同樣重要的一個部分。如果說講了半天，高職在傳授技術的功能方面令人懷疑，那麼不管是為了作何因應，高職的存在是不是還有必要？然而在目前的文獻當中，關於技術的部分似乎比較不受重視。

事實上根據一般的印象，高職的地位在幾十年間的確是每況愈下，高職畢業生也不再像過去一般吃香。就這部分而言，高職生的體驗恐怕要比其他人來得直接而深刻：高職教育對於其受教者——高職生來說，具有何種意義？是什麼因素或面向，造成過去和現在的高職生有不同的經驗差別？這些因素或面向又如何發生作用？要回答這些問題，高職生的受教經驗是相當重要的一個部分。高職生受高職教育的影響，應當是最為直接、深刻且廣泛的；根據高職生的就學、就業等人生經驗，可從另一個角度看出高職教育對社會的價值為何；從高職生的經驗出發，可回應到上一段所說，高職在技能訓練的功能上是否發生作用；從高職生的經驗出發，亦可從另一個角度檢證目前常見論點是否有所缺失。然而在這個部分，同樣也較未受到重視。

在本篇論文中，並不打算加入從人力資本、經濟發展、教育理論等角度來討論的高職變革之路，而是希望透過不同世代高職生的求學、就業經驗，重新檢視未受重視的高職生技能的問題，亦即高職是否傳授了技能的訓練，技能訓

---

<sup>15</sup> 「教育哲學家經常從人文、人本的角度來討論教育的功能；但從國家經濟發展的角度而言，教育也經常被視為人力發展計畫的一部份。」羊憶蓉、吳惠林（1996：3）

<sup>16</sup> 「技職教育常常成為培養『人力工具』的手段，對於個人人格的養成、性向潛能的全面開展即疏於照顧，製造出工業化、現代化影響下的『單面向的人』。」黃俊傑、陳昭瑛、吳展良（1995）。

練又對高職生產生怎樣的影響，是否幫助了高職生順利進入勞動力市場？除了技能訓練以外，還有什麼因素造成高職生技能地位上的變化？另有鑑於高職在數十年間的演變，因此需要從不同世代間高職生的這些經驗來探討差異。

### 1.3. 文獻回顧

高職教育因其歷史發展之原因，自始便和職業密不可分。歷來對於高職教育的討論，可以分成三大類：一為高職為經濟計畫下人力規劃之一部分，事實上台灣早期的經建計畫中的人力資源規劃，直接決定職業教育的方向；二為檢討高職成為經濟計畫、人力規劃下之附庸，並造成階級複製等效果，因之認為應將高職教育回歸教育本質；三為鑑於高職教育和產業之關係，因此將高職教育和產業技術發展一併論之。此數項分類只為了敘述方便，並不表示某文獻便只侷限於某類討論，也就是討論高職的文獻，也可能上述幾類都分別提到，或一併論述。

若以年代來分，可看出國內對此相關研究偏重方向之變化。早期對高職教育的文獻，多在探討高職是否達成經濟計畫要求下的人力規劃，或是針對高職制度、課程設計內容，引進、比較國內外高職課程理論，做為高職課程制度改進之建議，以及，觀照市場上對於技術之需要。討論應當採取何種高職設計、作法。在 90 年代，教改風潮風起雲湧之時，部分學者提出高職的一些弊病：強制分流的教育政策造成人格發展受限，高中職比例差異過大，高職將範圍限制在職業教育，有違全人教育精神，並因為知識經濟所需，綜合高中較能滿足這些要求。分流教育似乎造成階級複製，因此要求回歸教育本質。另一個討論角度，乃是綜合政治經濟、技術環境，討論諸多因素對於高職政策制訂過程的影響。

邱兆偉（1975）在「我國職業教育現況的檢討與改進的建議<sup>17</sup>」中，討論

---

<sup>17</sup> 本文有個有趣的方向，作者提及 1971-73 年他在美國德州所做的研究，針對高中職業課程與非職業課程畢業生的職業成就，來探討職業教育的成效。該研究結果提到職業教育並不足以提高每小時的平均薪資，也不會提高工作滿意度，但是「職業教育有利於就業時間的延長及每週工作時數的增加」，這是「職業課程（相當高職）」在每月收入上明顯比「非職業課程（相當於高中普通科）」來的多的原因。也就是說，如果就每個小時的薪資來講，看不出職業課程畢業生是比非職業課程畢業生具有優勢。作者在文後也提到，民國六十年代後期台灣高職生有較高勞動參與率，「足以說明技職教育可能加強畢業生就業及謀職的意願與興趣」，因此技職教育對青年而言，「若非有利於協助其謀職的努力，便是滿足就業的需要」。就這部分而言，作者並未提及職業教育在技術培養上的功用，而是在強調職業教育能提高畢業生在個人心理層面上有意願、興趣就職，並且願意接受較長的工作時數，類似是把高職教育的功能放在培養一個「態度良好的勞工」！

職業教育之目標、課程、規劃等等，主要的結論，在於：高職課程安排，既不足以培養向上研究的基礎，也無法勝任養成基層技術人才的任務；高職畢業生的供需與需求之情況並不完善；高職教育對個人而言，有助於工作的獲得；對於無法進入大專的學生家長而言，高職教育可說是一種有利的投資（中國教育學會，1975，原引自邱兆偉）。另外在邱兆偉（1982）所著「我國台灣地區技術及職業教育之檢討」裡，從供需規劃、勞動力參與率、及畢業生的經濟收入三方面，檢討台灣擴充技職教育之成果，主要目標在檢討擴充技職教育的政策是否得當。此研究將 1976 到 1989 年間，三項對技職教育有關的人力發展計畫，分別評估技職學校畢業生和市場的供需關係，結果大致上是：1970 年代高職生供過於求，在 1980 年代供求狀況則視類別而異。根據這些結果，作者建議技職教育政策應留意供需規劃上的偏差，回應到當時的政策，則是認為應當檢討當時擴充技職教育的政策是否適當，並認為太過快速的擴充，而未在師資、課程、學生養成、設備、教學品質等方面注重改善，可能不但反映不出政府的重視技職教育，反而有損技職教育的地位。

馬道行（1982）在「我國技術職業教育發展問題與改革動向」一文中提到，工業先進國家有「科技人力層次結構改變、工作領域移轉<sup>18</sup>」的現象，工業開發中國家在此結構變更的原因及程序上，主要配合工業發展計畫進行，「以漸進的方式，先由基層技能（Skill）的開始，然後發展到中級技術（Technique），再經高級工程技術（Engineering Technology）而邁向工程（Engineering）及基本科學（Basic Science）。」而這裡的基層技能，便是指透過職業學校養成的人力。對於 1966 年以後技職教育的蓬勃發展，作者給予正面的評價。作者針對當時狀況所提的建議，和高職有關的部分，則是認為：基礎課程（如數學、物理、化學等）應再加強，施行三十年的單位行業訓練課程<sup>19</sup>應加以檢討，專業教師應當進修，高中與高職（包括五專）入學人數比 3：7 的比例已經達成，宜預先規劃後續作法。

高職教育在教改會的研究報告裡，是以「分流教育」的分類來涵蓋<sup>20</sup>。謝小苓、張晉芬、黃淑玲（1996）提到，台灣的職業教育在民國四十年代以來，長期由經建計畫主導，而技職部門的成長主要靠私立學校。在教育政策中，將職業教育以人力規劃角度，視為「培養基層技術人力的機構」，但實際上職業教育又和產業脫節；在學校體系裡，「教育部又將技職教育定位為供能力較差

---

<sup>18</sup> 該研究提到，「科技人力層次的結構在 1945 年以前，主要是由科學家、工程師及熟練技術工三者所組成。1945 年以後增加為科學家工程師、技術員及技術工。1960 年以後變更為科學家、工程師、工程技師、技術員及技術工。」

<sup>19</sup> 關於單位行業訓練的介紹，詳見第二章。

<sup>20</sup> 教改相關研究把職業教育直接稱呼為「分流教育」，似乎是將職業教育「明顯地」有別於普通教育，這個用法和註三提到的分流的意義略有不同。



者所就讀的次等教育」，不過在這些貶低高職地位、不利高職發展的條件下，「高職生仍為台灣的勞動市場提供了眾多的技術人力 技職教育的貢獻值得肯定」。在民國七十年代以後雖然開始以教育的角度考慮相關政策，「但卻是 以抒解升學壓力為目標，而非以辦好技職教育為鵠的」。作者認為從教育觀點來看，職業教育「『從做中學』的學習取徑， 讓不同性向與興趣的學生有更多發展潛能的機會」為其特別之價值。也就是作者認為，不管從技術還是教育觀點，職業學校都有存在價值，只是「在此社會多元化、產業結構轉型之際，技職教育也必須要重新定位。」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認為目前教育部推動綜合高中以解決職業教育問題與升學壓力的作法，雖然值得試辦，但是如果高職仍然「繼續背負次等教育的污名」，那麼綜合高中的普通及職業課程，一樣會在內部形成不平等的關係；因此作者認為，「辦好技職教育 是綜合高中成敗的關鍵」（謝小苓等，1996）。

章英華、薛承泰、黃毅志（1995）在「分流教育與社會經濟地位」一文中，一開始便提到「透過教育改革，以縮減教育、職業、收入之機會不平等，是許多現代國家的政府與民眾所共同努力的方向。」作者認為：「在教育、職業、與收入取得的機會不平等性之根源裡，教育制度很可能居於關鍵的位置。」因此，作者針對家庭背景、教育分流制度、繼續升學的機會以及就業四者間的關連性，透過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進行量化分析，根據分析結果，作者發現：教育或文憑不僅和收入有關，更代表重要的社會地位，因此高職生的自我社會地位評估較高中生為低；而由於社會上謀求文憑的目的是職業、收入與社會地位，依此而言，廣設高中大學並不會就解決「全人教育」的問題；另外分流教育在機會不平等上所扮演的角色其實不甚重要，縮減技職教育、或是延後分流，並不會降低多少不平等。

黃俊傑、陳昭瑛、吳展良（1996）認為，從職業教育發展歷程來看分流教育，職業教育長期背負人力規劃的目的，「技職教育常常成為培養『人力工具』的手段」，教育變成了手段，遠離了真正的教育理念。另就社會層面而言，「強迫分流教育促使階級複製」，此為現今分流教育兩大問題。就改革方向上，「廣設綜合高中」為共識之一，使課程更為寬廣，也藉由「延後分流」使學生得以自由意志決定人生方向。作者認為教育改革必須顧慮台灣的社會脈絡，由台灣的情境思考技職教育的定位。另外，應當摒棄過去以人力規劃方向來思考的技職教育，使教育的思考回歸到「一項新的教育哲學基礎 教育的目標在於喚醒人的主體性，進而促使人與自然或人文情境之間達到互為主體性之境界。」

方俊育（2000）研究台灣戰後工業職業教育發展史，認為這段歷史是技術與政治兩種力量交互作用的過程。作者所指的政治，是指國家對工業職業教育的看法，由此促使工業職業教育的發展方向；技術則是指，工業職業教育以技

術學習為有別於普通教育的特色，因此技術的演進，會影響技術教育之內容及其學習方式。作者認為一般的討論是「不是 就是 」的極端，而作者所要探討的，就是這兩種力量在台灣戰後工業職業教育發展史上，都具有影響力，並呈現這兩種力量作用的過程。作者在文末提及，價值判斷並不是他本來的目的，但是若從該論文的角度來評論技職教育，則他認為不論是技術主導或為政治目的的達成，均會使得「教育或者受教育的人都變成次要的」，變成只是手段或工具。所以，現在如果要討論技職教育，應當回到教育本身而論。綜合高中內的職業學程，由於職業課程在歷史上往往背負著政治目的，因此職業學程的設計仍不會解決這些問題。或許就教育理想而言，如果中學都能強調教育的多元，那分流可能就不會存在，因為會各自形成一支支的分流，那麼這些問題才或許有可能解決。然而在現實上，國家意志仍會透過不同方式貫穿其中，理想和現實也會繼續拉鋸。

其他和高職相關研究，例如張清溪（1994）研究職業教育政策與人力規劃，發現其中互相衝突；施溪泉（1990）研究發現技職教育與勞動力市場之間，常有供需失調問題；康自立等（1991）認為職業教育內容和技能檢定項目相配合者並不多，而技能檢定資格也不受雇主重視（轉引自謝小苓 1996：2-3）。從上述種種文獻中，可以發現對於高職的研究，重視的項目大多在於：高職能否符合市場需求、與人力規劃間關係、政策決定過程、歷史過程與高職對社會的影響等等，另一類則是針對高職課程內容規劃、設計改變等等，以探討課程內容方面為主，其中較為缺乏高職生經驗的討論，亦即根據高職生的經驗，探討學校學習過程，以及高職經驗對受教者往後所產生的影響，而這部分應當是探討相關課題時重要的部分之一。

## 第2章 我國職業教育政策之演變

這一章介紹何謂職業教育、我國職業教育體制興起的緣由、以及我國職業教育政策在 1940~1980 年代間的演變。

職業教育 (Vocational Education) 係指中等教育程度一種以就業為目標的教育，職業教育以培植基礎技術人力為主，其教學內容注重傳授工作技能、知識及培養工作習慣及服務道德等 (張波鋒, 1988: 91)。依據教育廳編印之職業導師手冊敘述職業教育的特質：「職業教育就是運用經濟有效的方法，依據個人的性向、能力與興趣，培養從事某種特定職業所需的知能，以養成健全的基層技術人才，因此職業教育重視能力培驗，注重實作的教學，強調技能的學習，並兼顧文化陶冶與職業道德的培養」(張波鋒 1988: 92)。

我國職業學校訓練體制的興起，從其歷史演進的過程來說，源自於師徒制，龍冠海指出，因為有傳授文化技藝的需要便有教育及訓練制度。由於我國過去農業社會結構單純，所需之手工藝傳習多來自於代代相傳的學徒制度。受到歐風東漸科技工藝的影響，及列強優勢軍力侵略的影響，滿清政府覺悟到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開始創辦職業教育與技職訓練 (張波鋒 1988: 71)。民國成立，延續清末富國強兵的思想。民國十八年，頒佈工廠法，列有「學徒」一章，為我國現代職業教育訓練之開始 (張波鋒 1988: 69-75)。

我國職業教育政策與時代背景的變遷，政府實施的經建計畫和人力發展計畫有密切的關係。高職為經濟計畫下人力規劃之一部分，而台灣早期的經建計畫中的人力資源規劃，直接決定了職業教育的方向。下面介紹的是職業教育政策隨著時代背景的變遷與經建等政策產生了哪些轉變。

1940 年代，國民黨政府遷來台灣，全面改革與建設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確立了職業教育的目標。此階段為台灣職業教育的改制與整頓期，部分職業補習學校改設為初級中學，其餘的職業學校與補習學校斟酌地方需要，分別改制為省立或縣立高、初級職業學校，一律實施六三三學制。初職以培育各種初級技術人員為主，課程重視技能訓練。高職以培養中級技術人員為主，課程除重視實際技能訓練外，還兼顧基本理論 (紀經峰, 1986; 羊憶蓉等, 1996: 17)。

1950 年代我國開始著重發展工業，以農業培養工業。特別是替代進口的勞力密集輕工業，農業人口佔全體產業就業結構的一半 (羊憶蓉等, 1996: 145-147)。1951 年，由於職校校舍與設備簡陋，師資缺乏，教育內容空泛，實用技術訓練不足，畢業生大多缺乏實用技術，無法適應當時所需基層技術人力技

能要求，透過美援計畫之資助，派遣職業教育行政人員及學校校長及教師，實地赴美等地考察，以利各項改革工作之有效推展。政府除編列經費預算擴充職業教育容量外，並接受美援，充實更新教學措施，改進教學型態與教學方法。改革措施包括確定高初級職業學校教學目標、簡化高初級職業學校所設科別、調整各科教學科目及每週教學時數。此一時期各項改革，僅以解決職業教育本身問題為重點，對於如何配合人力需求的觀念尚未形成（紀經峰，1986）。1952 至 1956 年，政府實施第一期經建計畫。1953 年 2 月，明訂職業教育之宗旨為：「培養技術專門人才，配合國家經濟建設之需要」，從此職業教育受到相當大的重視（羊憶蓉等，1996：17）。1957 年推行實用技術訓練，在各職業學校極少數設備良好的普通中學內設立農、工、商、家事等類科訓練班（張波鋒，1988：77）。

1960 年代，我國朝向工業技術密集度較高的工業發展。勞動力對於人力的需求，由非技術勞工轉向技術人力為主。中期，台灣經濟快速成長，工業部門快速擴張，對工業技術基層人力大量需求。此時出現人力規劃的構想。1966 年行政院正式公布人力發展計畫。1960 年代前半，工業就業人口比例維持平穩，從 1960 年代後快速爬升，服務業人口亦在此段期間上升。民國 1965 年實施第四期經建計畫，職業教育的改革重點包括：一、農職學校兼辦工科；二、擴充工業職校學校容量；三、配合九年國民教育，調整擴大省轄縣市立職業學校為省立職業學校；四、試辦工職建教合作實驗班；五、申請世銀教育貸款；六、試辦階梯教學實驗（紀經峰，1986：166）。1968 年九年國教實施，影響職業教育之組織與結構。人力發展計畫決定擴張職業教育，擴張職業教育的政策因此形成，並決定以工業職業教育為優先擴張重點。所有私立學校在國中階段的普通教育措施全部停辦，而改辦高級職業教育之類科。使原有以公立為主的工業職業教育措施完全改變。私立學校與公立學校之校數比變為 2：1，高中高職人數比由 55 年的 4：6，在 1976 年達到 7：3。職校人數激增，工業職業學校的學校人數佔 60%，成為台灣職業教育中非常重要的轉捩點。這個作法一方面是希望吸納忽然增多的國中畢業生，一方面希望導引接受職業教育者畢業之後進入勞動力市場，以減緩升學壓力，並應付工業部門所需人力（羊憶蓉等，1996：18）。

在職業教育內容方面，1953 年至 1964 年期間為我國職業教育邁進新境界時期，對這一時期的重要改革措施有兩項：

#### 一、設立工業職業教育師資培育機構：

於大學設立工業教育學系，分為工業教育甲、工業教育乙、工藝教育等三組。甲組為培養單位行業工場理論師資，乙組為培養單位行業工場實習師資，工藝教育組培養高、初中所需工藝科教師。後因應考學生技術條件不足，工業教育停止招生，迨工業學校有單位行業科學生畢業之後再行

恢復招生。教育部當時基於部分工職即將實施新制（單位行業訓練）教學，工場實習教師需求殷切，遂核定師範學院工教系增設工場師資訓練班，招收高中畢業具有工場實際經驗六年以上或高工畢業具有實際工場經驗四年以上者，訓練一年，分發充任工場實習教師。

## 二、工業學校實施單位行業訓練教學，試辦建教合作：

台灣省教育廳於 1953 年，接受美籍顧問建議，工業職業調查，以了解社會對職業需要的情形。而第一期四年經濟建設，鑑於職校之培育技術人力，未能配合事業單位生產之需要，於台中工職首先試辦單位行業訓練，運用美援添購設備，其訓練目標以培養行業技術工匠為主，故重實務，理論輔之，再佐以必須之公民基本科目。各科教學時數每週三十六小時，其中工廠實作十五小時，相關知識七至九小時。1955 年，於七所省立工職（新竹、台中、彰化、嘉義、台南、高雄及花蓮工職）及台北市立工職實施單位行業訓練教學，培養機工、電工、汽車修護、建築木工、管鉗工、木模工、鑄工、板金工、印刷工等九種單位行業科，以培養工業界所需的行業技工（紀經峰，1986：163-165；張波鋒，1988：77）。

所謂單位行業訓練是將學生在學校學習的專業技能訓練，採單一行業所需的主要技術為範圍，使學生在校有限的時間內能專精學習一類技能，俾學有所長，提高技術水準。其目的在於訓練未來的行業技術人才，使工業界能獲得實用技術人才，以加速推展工業及促進經濟發展。（紀經峰，1986：164）而為配合單位行業訓練教育的目標，所調整課程配置，增加工廠實習至每週十五小時，佔全部課程百分之四十以上，相關理論科目每週九小時，只百分之二十五，其餘為普通課程（紀經峰，1986：145）。

1970 年代，台灣對外貿易由入超變成出超。使工業面臨升級的轉型期（羊憶蓉等，1996：146）。1972 至 1976 年實施第四期經建計畫，規劃發展人力資源，加速發展培養適質適量的各類人才，就擴展工業教育來培養所需技術人才，同時推動十項建設。此時初級勞力在市場需求上仍感不足，而技術勞力因為職業訓練尚在起步階段也同樣缺乏。因此造成教育擴張過速，質量未能並進。1970 年 8 月試辦西德職業教育階梯式教學。1976 年技術及職業教育配合發展經濟建設六年計劃，建議實驗「職業群集教學」，加強輪調式建教合作。1979 年，為配合經濟建設與工業發展，開始實施三期期工業教育改進計畫（謝小苓等，1996：50）。改善傳統單位行業課程，引用美國群集課程精神，擴增職業學校學生的學習廣度。

1980 年代以後，台灣的政治經濟結構都明顯的轉型。產業結構方面服務業快速的擴展，「一般教育」重於「專門技術教育」的概念漸出現。政府的經建部門以此為考量開始檢討國高中人數比例（羊憶蓉等，1996：148）。1980 年代初期，出現職業學校為了經由技能競賽爭取學生保送升學的機會，而影響學

校正常教學活動，可見職校的學生升學需求已經相當迫切。面對這種現象，教育部的對應之道不是調整職業學校的教育目標，拓寬技職系統的進修管道，而是堅守「培養基層技術人員」的宗旨，企圖以加強職業介紹與就業輔導，防堵日漸升高的升學需求。另一方面教育部繼續以保送升學，做為技能競賽優勝者的獎勵，並藉著維持這種獎勵的稀有性，再度確認高職教育在學校體系中的次等地位（謝小苓等，1996：50-53）。

1982年推出第二期工業教育改進計畫。1983年起開辦「延長職業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調整高職設科及課程。繼續擴充工職其他科以及農機、輪機科的廠房設備。提高師資水準，調整設科，並在四所學校進行「職業群集」的實驗課程。1986年推行第三期工業教育改進計畫，在第二期的課程實驗基礎上，正式推動新課程，並針對新課程的需要，補充設備與實習廠房，培養師資，提供進修機會，發展配合新課程的教材教法，並輔導學校發展特色。第二與第三期的目標為「配合經濟建設、工業發展、培養基層技術人員」，主要是鼓勵職校畢業生參與基層技術生產，並檢討工職畢業生保送升學的辦法，改變升學概念（謝小苓等，1996：50-58）。1987年，教育部技職司提出「技術及職業教育十年發展計畫草書」，指出技職教育面臨升學管道狹窄，課程設計諸多不當的等諸多問題。在參考英、德、日等國技術教育政策之後，計畫以建立完整技職教育體系，提升技職教育水準，以及推動延教班等三方面做為未來發展方向。

1992年，在「發展及改進技術職業教育中程計畫綱要」關於技職教育問題的描述與改進策略，幾乎是「技術及職業教育十年發展計畫草書的翻版」。而學生就讀意願低落的現象卻更行嚴重（謝小苓等，1996：56）。

現將職業教育政策是如何隨著時代背景、經建計畫、人力規劃政策產生演變，做以下的對照。

表一：我國技職教育政策之演變

年代	背景	經建計畫	人力規劃	職業教育政策
1940	國民黨政府遷來台灣，全面改革與建設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確立了職業教育的目標。			戰後初期 台灣職業教育的改制與整頓期： 1.將部分職業補習學校改設為初級中學，其餘的職業學校與補習學校。 2.一律實施六三三學制。 3.初職以培育各種初級技術人員為主，課程重視技能訓練。高職以培養中級技術人員為主，課程除重視實際技能訓練外，還兼顧基本理論。

1950	1951 著重發展工業，以農業培養工業。特別是替代進口的勞力密集輕工業。	1953-56 第一期經建計畫	1950 年代重農業，農業人口佔全體產業就業結構的一半。	1952 年： 接受美援，充實更新教學措施，改進教學型態與教學方法。設立工業職業教育師資培育機構，同時工業學校實施單位行業訓練教學，試辦建教合作。  各項改革措施：  1.確定高初級職業學校教學目標。 2.簡化高初級職業學校所設科別。 3.調整各科教學科目及每週教學時數  1957 年：推行實用技術訓練 1953 年至 1964 年： 工業教育邁向新境界。
1960	1960 年代： 朝向工業技術密集度較高的工業發展。	1965-1971 實施第四期經建計畫，規劃發展人力資源，加速發展培養適質適量的各類人才，擴展工業教育來培養所需技術人才。	1966 第一期人力發展計畫  1966-69 高中職學生人數比例 6：4  1969-73 第五期四年經建計畫 比例 5：5	九年國教實施，影響職業教育之組織與結構，人力發展計畫決定擴張職業教育，並以工業職業教育為優先擴張重點。  職業教育的改革：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農職學校兼辦工科</li> <li>➢ 擴充工業職校學校容量</li> <li>➢ 配合九年國民教育，調整擴大省轄縣市立職業學校為省立職業學校</li> <li>➢ 試辦工職建教合作實驗班</li> <li>➢ 申請世銀教育貸款</li> <li>➢ 試辦階梯教學實驗</li> </ul>
1970	1971 年，台灣對外貿易由入超變成出超。使工業面臨生級的轉型期。	1973-76 年第六期四年計畫：積極促進資本及技術密集之興建，兼顧勞力密集工業之發展，以提高工業技術水準。同時推動十項建設。	1971 年第三期人力發展計畫草案：6:4  依第四期人力發展計畫（1973-79）、第六年四年經建計畫、第七期六年經建計畫：7:3	1971 年八月試辦西德職業教育階梯式教學。  1976 年技術及職業教育配合發展經濟建設六年計劃，建議實驗「職業群集教學」，加強輪調式建教合作。  1979 年 第一期工業教育改進計畫

1980			<p>1979-86年，7:3維持期。</p> <p>1986年後重新檢討人數比</p>	<p>1982年 第二期工業教育改進計畫</p> <p>1983年起開辦「延長職業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調整高職設科及課程。</p> <p>1986年 第三期工業教育改進計畫</p> <p>1987年 技術及職業教育十年發展計畫草書：計畫以建立完整技職教育體系，提升技職教育水準，以及推動延教班等三方面做為未來發展方向。</p>
------	--	--	--	--



## 第3章 研究方法

「你們寫論文不是應該很簡單、問卷做一做就好了？怎麼我看你還要問這麼多問題，好像寫得很痛苦的樣子？我以前有做過一個問卷，那是同事的小孩在寫論文，寫什麼公務員在職進修有沒有必要什麼的，我看他就做做問卷而已啊，那個問卷我還覺得都設計過了，大概都是問什麼問題，你幾乎理所當然就會選那個答案，這樣我覺得好像做這個問卷沒什麼意義。」（羅文宜）

### 3.1. 質性研究方法

社會研究法可概略分成量化及質化兩種，這兩種方法在蒐集資料時，「前者多用調查問卷，後者常用參與觀察或深度訪談。」（劉仲冬，1996）在第一章部分曾提過，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於希望透過不同世代高職生的求學、就業經驗，重新檢視技術培養未受重視的問題：高職是否傳授了技術的訓練，技術訓練對高職生又產生怎樣的影響；除了技術訓練以外，高職對高職生的價值為何？為了得到高職生自身的經驗，本論文採用的是質化、深度訪談的方式，而非問卷的方式。因為問卷所能得到的結果，侷限在既定的問題，同時所得到的答案必須經過一定的設計，而每個高職生的求學、就業經驗各有不同，並沒有辦法預先設定好答案的範圍，或是透過幾個固定的問題就能得到答案。因此，透過質化的方式，以深度訪談來了解高職生的受教與就業經驗是有其必要性的。

#### 3.1.1. 深度訪談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的方法收集資料，根據劉仲冬（1996）：「訪談法中可分『非結構式』、『半結構式』、及『結構式』訪談。非結構式訪談往往是以日常生活閒聊式（everyday conversation）取得內情。半結構式是以『訪談大綱』來進行訪談。」我所採取的方式介於非結構式和半結構式之間，也就是雖有預擬的訪談大綱，但是並不一定按照大綱內容、順序訪談，而是透過日常閒聊方式進行。採用這種方式，是因為希望受訪者能盡量放鬆心情，不要覺得自己是在接受嚴肅的訪問。依照原先設定好的訪談大綱，順著聊天的內容，慢慢帶進我所要問的問題。在離題太遠的時候，適時把聊天內容拉回原本要談的事情，但也不要要求一定都要把範圍限定在訪談大綱內容，一部份是因為順著既有的話題聊天，可使氣氛顯得比較熱絡，另一方面我也發現，有時原本看來似

乎不相關的話題，也可以得到和預擬問題有關的答案，或者意外的得到更多或更深入的資料。

### 3.1.2.訪談進行方式

進行訪談的時候，並沒有限定在固定的情境中進行，而是隨著受訪者個人的時間、空間及意願而為之。有的訪談在受訪者家中進行；有的訪談在受訪者的休閒場所進行；有的則是受限於時間、距離等因素，而以電話訪談的方式進行，以電話訪談的受訪者因為和我有一定的熟識度，並不會因為無法面對面地進行訪談而顯得不自在，因此並不會影響資料的收集。在訪談的時間長度上，雖然不一定都能長達好幾個小時，但至少也足以進行相當程度以上的訪談。雖然訪談是利用受訪者空下來的時段，但因為訪談以聊天方式進行，也不要求受訪者不能與所處環境互動，因此在訪談過程，偶爾會遇到周遭親人探訪、電話接聽等事件，但並不至於干擾訪談。

### 3.1.3.資料紀錄

訪談的記錄方式，為了避免因為錄音造成受訪者的困擾，影響受訪者心情的放鬆，除了和受訪者有相當的熟識度或不會受到錄音影響的人外，原則上都是採用現場一邊訪談、一邊記錄下重點的方式，把訪談內容速記於筆記上。在訪談結束之後，當天或隔天把筆記記錄成訪談稿的格式，趁印象仍然清晰的時候，盡量把訪談提到的內容以逐字的方式紀錄下來。雖然有時訪談中得到的部分資料似乎與研究問題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當時看似沒有相關的東西，在事後回想時，往往還會有新的發現。除此之外，平常若是想到或是和老師同學討論到值得記錄的觀點，也會盡快整理成筆記，以便日後回想。

## 3.2. 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透過訪談取得受訪者之求學、就業經驗之相關資料，訪談內容包括受訪者：為何選擇進入高職、選擇某科別之原因、在學校所受的訓練方式、畢業後求職的管道、類別、以及工作狀況等。本研究是從受訪者受教、就業的經驗出發，分析受訪者對就讀於高職可能抱持怎樣的看法，學校所學和現場工作實務上是否有差異，而不同世代間的經驗差異是否有差別？又是在哪些方面有所差異？這些差別說明了什麼？

### 3.2.1.研究對象世代的界定

關於世代選擇方面，是以 1950、60 年代前後（四、五十歲），與 1970、80（二、三十歲）年代前後出生的受訪者做為兩個比較的世代。選擇這兩段時間來作世代上的差異比較，是因為依據我國的教育政策，在 1960 年代末期以後，政府逐漸開始要將高中、高職人數的比例由 6：4 調整為 4：6，在 1970 年代初，政府更進一步的打算要將人數比調整為 3：7<sup>21</sup>。在高中數目幾乎沒有改變下，這些比例的調整，實際上是透過鼓勵私人興學來完成，因此在 1970 年代開始，短短幾年間，有大量私立高職設立，而這一點堪稱高職教育史上的一個重要轉變。第一個世代的受訪者，就讀高職的時間，是在高職大量設立之前，第二代則是在高職大量設立之後才進入高職就讀。為了要有明顯的區隔，將高職數量大量增設的這十年間，排除在研究範圍外。

### 3.2.2.訪談對象

訪談對象是以曾經就讀高職的人為主，希望以高職生為主體，從受訪者的經驗為切入的角度，藉以瞭解高職教育的發展、功用，以及在實務上的角色功能為何。本研究同時訪問了高職相關人士。訪談高職的相關人士，是希望能增進對高職生在學以及就業情況的了解。而訪談的目的在於瞭解這兩個世代高職生受教與求職經驗以及世代的差異為何。訪談的對象主要為：

- (1) 第一個世代的受訪者：是現年四、五十歲，曾就讀高職者；
- (2) 第二個世代的受訪者：是現年二、三十歲，曾就讀高職者；

此外也訪談了相關人士，包括高職教師與工廠管理者。訪談高職教師的目的，是因為希望藉由教師對高職變化長期的觀察，增加對高職生求學經驗的瞭解。訪問工廠管理者則是藉由其對高職生在工作現場狀況的長期觀察，增加對高職生求職經驗的了解。同時希望以跨兩個世代的高職教師或是工廠管理者為訪談對象，從他們的觀察，了解兩個世代是否有差異存在，存在的差異與原因又為何。

---

<sup>21</sup> 請參閱第二章。

### 3.2.3.訪談對象的來源

訪談對象的尋找，首先從自己周遭認識的親戚朋友開始，亦即在符合上述年齡範圍的親友裡面，打聽有哪些是曾經就讀高職的。其次是透過朋友介紹，尋找符合條件的人選。

必須提到的是，第一世代的受訪者，在他們念高職的時候，因為尚未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高職教育分別實施在不同的學制中。在中學階段的職業教育，包括初職、高職與五年制職業學校；而當時的初職則相當於職業學校的初中；高職和現在的高職相同，採三年制。而五年制的職業學校，指的是需要修業五年才能畢業的職業學校，畢業後的學歷與高職相同。第一世代的受訪者，也包括了就讀五年制職業學校的人。

### 3.2.4.研究對象背景

本研究在高職生方面，受訪者共 11 人，其中第一世代五人，第二世代六人。在相關人士方面，高職教師一人，產業界工廠管理者一人。現將受訪者基本資料製表如下：

### 3.2.4.1. 第一世代高職生

表二 第一世代受訪者基本資料

	林靜怡	羅文宜	張文彬	邱心儀	許書文
年齡	50	55	47	48	47
性別	女	女	男	女	男
就讀科別	商科	商科	農科	商科	電機科
就讀學校	私立商職	公立商職	公立農校	私立商職	省立高工
最高學歷	專科（現就讀研究所）	專科	五年制職校	五年制職校肄業	技術學院（現就讀研究所）
直接升上高職	是，但就讀高職期間時曾休學一年	初職畢業考上	國小畢業考上五年制職校	國小畢業後約五年才升學	初中畢業考上
現在居住地	新店	高雄	埔里	屏東	土城
就讀高職時居住地	新店	豐原	埔里	桃園	瑞芳
初職	私人公司文職人員	私人公司文職人員	農	電子工廠	紡織工廠水電維修
現職	公營事業文職人員	公營事業會計人員	自耕果菜農	自耕果菜農、家管	高職教師
訪談方式	電話	電話	農藥行	親戚家	受訪者家

### 3.2.4.2. 第二代高職生

表三：第二世代受訪者基本資料

	陳彥柏	郭文豪	游純梅	曾友潛	洪家昌	游勇權
年齡	34	25	26	32	26	17
性別	男	男	女	男	男	男
就讀學校	私立商工	省立高農、 高工	國立綜合高 中	國立綜合高 中夜間部	私立商工	私立家商
就讀科別	電子科	農藝、電工	商業經營	商業經營	資訊科	餐飲、資訊 科
最高學歷	專科（現就 讀研究所）	高職	專科	高職	高職	高職就讀中
是否直接 升上高職	國中畢業考 上	國中畢業考 上	國中畢業考 上	國中畢業七 年，退伍後 就讀	國中畢業考 上	國中畢業考 上
現在居住 地	汐止	埔里	埔里	埔里	屏東	苗栗
就讀高職 時地點	新店	埔里	埔里	埔里	屏東	苗栗
高職畢業 後初職	電子工廠作 業員	扛水筍雜工	書局店員	農	工廠工人	在學（白天 在馬達工廠 做工）
現職	高鐵	造紙廠	兒童美語	農	鑰匙工廠	學生
訪談方式	受訪者家	受訪者家	受訪者家	紅茶店	親戚家	受訪者家
其他		國中畢業沒 考上高工， 就讀高農一 年後轉學高 工		年淨利數百 萬的自耕農		高一唸完後 ，因為想要 在經濟上獨 立，因此轉 到夜間部

### 3.2.4.3. 相關人士背景

#### 一、高職教師

高職教師受訪者有一人，該位受訪者本身亦為高職畢業（即為許書文），現年 47 歲，從事教職二十二年，其中曾中斷三年，因此從最初擔任高職教師至今，已有二十五年之久，加上本身從高職畢業，可說對高職的觀察與感受橫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許書文剛開始是擔任高職技術教師，負責實習課程教學，所需學歷為專科畢業，然而因為實習課程時數減少，實習教師需要數量也隨之減少，因此許書文再進一步修讀技術學院課程，並取得教育學分，轉任為一般教師。

#### 二、工廠管理者

工廠管理受訪者一名，該受訪者現年 57 歲，國立大學化工系畢業，任職於國內某著名石化企業集團，迄今三十餘年。進入該公司從基層管理者開始，歷經課長等職位，現擔任中高階管理職務。從擔任基層管理職位至今，受訪者都和第一線現場工作密切接觸，對於新進員工狀況、以及必須接受訓練等等，瞭解至深，因此受訪者的經驗相當適合用以輔佐參考高職生在工作現場上的技能表現。

## 3.3. 訪問問題

不同受訪者所預擬的訪談大綱如下：

## 一、高職生受訪者的訪談內容

表四：高職生受訪者訪談大綱

主題	內容
1.求學經驗	1-1 為何選擇進入職校
	1-2 科別
	1-3 受教過程/訓練方式
2.就職經驗	2-1 求職的管道
	2-2 求職的過程
	2-3 經歷
3.個人勞工史	3-1 工作的經驗
	3-2 工作內容(技術)
4.求學與就職的差異	4-1 覺得學校所學與在職場實務上的差異為何? 如規定,工作場所環境的差別,教導方式
5 當時背景	5-1 當時的時代背景
	5-2 產業狀況
6.對職業教育的看法	6-1 對當時高職教育的看法,包括:高職的制度,地位,角色,功能
	6-2 對現今高職教育轉變的看法:
	6.2.1 成為最後的選擇,轉變原因
	6.2.2 廢除技職學校的看法
	6.2.3 制度,地位,角色,功能

## 二、其他相關人士的訪談內容

表五：相關人士訪談大綱

主題	內容
1 對職業教育的看法	1-1 對職業教育的看法:包括高職的制度,地位,功能,政策等
	1-2 廢除技職學校的看法
	1-3 對於職業教育是否是最後的選擇的看法
2.技術部分	高職所學是否能符合職場所需



## 第4章 田野資料初步分析

這一章是兩個世代田野資料初步的分析結果。探討的是兩個世代受訪者選擇就讀高職、科系選擇的原因為何、受教的過程、從事工作與高職所念的科系是否相關、高職所學是否能學以致用以及對高職的評價為何。第一、二節是兩個世代田野調查的初步分析，而第三節則是兩個世代各問題的初步比較。而在第五章會提出更進一步的分析。

### 4.1. 第一世代田野調查初步分析

本節討論第一世代受訪者，也就是現年四五十歲的受訪者，他／她們就讀高職以及畢業後工作的相關經驗，以及初步分析。

#### 4.1.1. 選擇高職的原因

在這個世代，國民教育年限為六年，在六年國校畢業之後，會繼續升學的比例相當低，根據受訪者印象，大約在百分之十而已。如許書文說：

「國小畢業以後升初中的也不多，要用考的嘛，大概只有百分之十左右，大部分都不會繼續念。家裡有很大的影響，一般礦工的家庭，都會希望小孩國小畢業就趕快去工作貼補家用，礦工的日子過得很苦，錢不夠用，都會希望小孩趕快幫忙，所以大部分的礦工家庭，小孩也是繼續作礦工。我爸爸做礦工以前做過生意，他就覺得一定要盡量讓小孩唸書，能念就盡量念。」（許書文）

在訪談裡，就讀高職的原因是由不同方面綜合而成。

##### 一、覺得考上高中遙不可及

在個人方面，受訪者許書文認為，認為當時大學很少，念大學是極罕見的事情，好像大學距離自己是相當遙遠的，覺得自己程度不夠，如果念高中也考不上大學，因此從一開始便沒有考高中，而是直接將目標放在高職。林靜怡就讀高職後曾因故休學，但是在復學的時候，覺得自己想要唸書，不願意念夜間部半工半讀，在自己的堅持下，選擇日間部就讀。他說：

「初中畢業在考的時候，我就沒有去考高中，那時候大學很少，覺得

大學很遙不可及，根本沒幾個人念，自己知道程度不夠，所以就沒有考高中，以就業為主要考量，就去考高職。」（許書文）

## 二、沒考上高中或比較好的高中

有的受訪者會去年高職，是因為沒有考上理想的高中，如林靜怡說：

「我會去念高職是因為高中沒考上比較好的學校，就想說去念高職，去念開明夜間部。」（林靜怡）

除了沒考上比較好的高中外，沒考上高中，也是這個世代選擇念高職的原因。不過從訪談中發現，除了沒考上高中外，與當地的升學選擇限制也有關係，例如受訪者張文彬提到，在當地只有一所高中和一所高職。學校選擇有限，加上當時張文彬並未想到要離開家鄉到外地去唸書。因此對他而言高中沒考上，就是去念高職。他說：

「我是 55 年的時候念職校的，那時候埔里只有一間職校，考不上初中就是唸初職，我沒考上就是去念初職了。我念的是五年制的，就是國小畢業考進去後，念五年之後畢業，有點像後來有國中以後，去念五專的那種。」（張文彬）

## 三、在職場覺得學歷與所學不夠而繼續升學

受訪者邱心儀，國小畢業做後就從事幫傭的工作，十六七歲時從屏東到桃園某電子工廠當作業員，做了兩三年都沒有升職，邱心儀了解到這是因為學歷不足的限制，所以興起唸書的念頭。她說：

「那時候做了兩三年，薪水都沒有變多，有啦，有是有多一些，就多給調一點點，像是年資那種，可是很少。可是我做兩三年算很久了，都沒有給我升，升的話薪水調比較多，那後來就有人跟我講，說我就是因為學歷不夠，我只有國小畢業嘛，當領班要有學歷，所以我就升不上去。我就想說那我要再去唸書，這樣錢升得比較快，我就去補習，準備要考試。要考試也要補啊，不然我們很久沒有唸書了，一定考不到。我一個月一百要補習根本不夠，就要休息的時候加班，加班可以多一半的薪水，就在禮拜天休息的時候加班。後來我就考上，商科，是那種五年制的專科，要念五年，出來等於是高職的學歷。」（邱心儀）

## 四、性別因素

從訪談中得知，影響這一個世代的人選擇高職原因，其中一項與性別有關，受訪者羅文宜回憶自己念高職的原因，雖然不記得是因為沒考上初中，或是因為父親的決定。但是卻提到與他同齡的同學中，念高職的都是女性，她說：

「我在唸高職之前是唸初職的，已經忘了為什麼是去唸初職，不曉得是因為初中沒考上，還是因為爸爸叫我去念的了，念的是豐原商職。我們國小的時候有兩班畢業班，大概一百二十幾個人吧，畢業後有再唸書的大概二十多個，實在也不多。如果以女生來講，有人在初中的時候考到普通初中，有一個台中女中的，可是後來到高中的時候，全部的女生都是念高職的，沒有一個念普通高中的。」（羅文宜）

從訪談中得知，這一個世代的人選擇念高職的原因，一部份是因為當時高中數量有限，要考上高中並不容易，而考上高中就等於要繼續升學才有用，否則考得上高中，上不了大學，在將來求職上反而不如高職有一技之長。而其他選擇高職的原因包括考不上好的高中、經由家裡決定而選擇高職、覺得所學不足、以更高的學歷增加升遷機會，而其中性別與所處環境升學選擇有限是較值得注意的因素。

#### 4.1.2 科系選擇的原因

從訪談中得知，這一個世代選擇科系的依據，與當時對科系的評價、學校類型和性別有關。

##### 一、受當時觀念影響，選擇熱門科系

受訪者許書文高職時念的是電機科，他提到主要是受到家裡的影響，因為家裡覺得念電子、電機類出來比較好找工作，他說：

「我高職的時候念的是電機科，這個決定主要是家裡來的，那時候主流就是覺得電子、電機啦就是比較好，家裡也這麼認為，其實十幾歲的人是沒有辦法決定自己想做什麼的，就我自己的經驗來說就是這樣。」（許書文）

同時許書文認為十幾歲的人其實無法替自己作決定，多半是由家長做決定，而家裡的觀念，其實是受到他人的影響，他說：

「十幾歲的人沒辦法決定什麼，沒辦法自己思考，所以都是根據家長的意見，家長又是從哪裡聽來的？當然也是從別人那邊聽來的，那時候就是做水電、電機工作最有保障，當然就會認為念電機很好。像現在說要用綜合高中取代高職，就是不要那麼早分流，因為志向都還未定嘛。」（許書文）

而不管是因為受到家裡觀念的影響或是受到社會觀念的影響，都可以發現

，當時產業界最需要哪幾類的技術人才，從中也可以發現，受訪者選擇科系與就業機會的高低有關。

## 二、與學校類型有關

雖然同樣是高職教育，但是每一個高職設立的科系不同，以張文彬念的高職為例，張文彬的學校本身就是農校，因此所有的科系都與農業有關，自然而然的，張文彬所選擇的科系也與農業有關。他說：

「我們學校當時是農校，因此所選擇的科系都與農業有關」。

從張文彬的訪談中，我們可以知道學校的屬性也是影響學生選擇科系類別的原因之一。

## 三、性別因素

而在訪談中，女性的受訪者念的都是商科，女性受訪者認為原因與他們的性別有關，例如羅文宜說：

「我國小同學有升學的人裡面，到高中的階段，女生都是念高職，本來有一個念初中的，可是到高中階段還是來念高職。當時社會上女的好像都念商科，我們班也是這樣。」（羅文宜）

而這樣的選擇或許是受到社會上一般觀念的影響而決定。這裡值得一提的是邱心儀的例子，邱心儀因為希望可以升職，而在國小畢業好幾年後才去念職校，然而她所選擇的商科，和所工作的電子工廠作業員的工作可說是一點關係也沒有，可是該工廠的升遷，是以學歷高低做決定，與科系是否有關，並不重要。至少在邱心儀的這個個案中是如此。

### 4.1.3.學習過程的印象

#### 一、就學壓力

##### （一）壓力小、活動多

回憶起念高職時的生活，有的受訪者感覺當時念高職比高中壓力小，如受訪者羅文宜覺得念高職功課壓力很小，過得很輕鬆愉快，看到念高中的妹妹，念得很辛苦，第一年就因為念不好而留級，覺得念高職是比較適合自己的，不然如果去念高中，痛苦也痛苦了，可是書還是念不會，她說：

「我覺得念高職就是壓力很小，念得很輕鬆，不像我一個妹妹念高中

，功課很重，第一年就留級了，念得很痛苦。我們常常一本書也沒教完，裡面選幾篇出來教，考試前有的老師還會劃重點，你只要把重點背好了，基本分就會拿到，這樣就好了。珠算就是一直練習練習了，如果那種珠算可以練到一、二級的人，畢業就很容易進銀行，就算鐵飯碗了。」（羅文宜）

而她對高職階段的印象，大部分都是在生活中常常發生的一些輕鬆愉快的事情。當時的商科並沒有區分國貿、會計等類科，而是就一個商科。一個學期一本書常常教不完，學校老師在考試前會劃重點，考試內容大多從重點裡面出，這樣大家有明確的準備方向，羅文宜說至少最基本的東西也學到了。學校對珠算的程度，設有畢業的門檻，如果珠算不到三級的，便不能領取畢業證書，如果在學三年內還沒通過，就等到通過了才可以回學校領取畢業證書。不過若是能通過珠算一、二級的，畢業之後很容易進入銀行，在當時這樣的工作算是鐵飯碗了。同時她也提到對當時念高職的印象，就是覺得課外活動多，她說：

「念高職就是課外活動很多，因為高中課業壓力比較重嘛，那時候政府辦的活動又比較多，像閱兵的時候要去踢正步，我們還有同學真的在踢正步的時候把鞋子踢出去，飛到前面去，真的飛出去喔！還要去軍訓課的行軍、打靶，從豐原走到大甲，吃飯要野炊，半夜搭帳棚睡覺，還會突然吹緊急集合哨，我們都不敢睡，都把衣服鞋子穿好好的在身上。」（羅文宜）

## （二）功課自由、要求不多

受訪者許書文覺得學校在功課上滿自由的，不會有太多要求，老師們有兩類，共同科由一些外省人教，教得很差，但是教專業科目的老師，是師大工教系畢業的，專業素養好，教學也認真。他說：

「學校在功課上滿自由的，但是老師的素質差滿多的，大概分成兩類：一種是外省來的老芋仔，一種是師大剛畢業的。外省的大概都教一些共同科，像國文、英文、物理、製圖那些，他們的程度都很差，英文最差，從以前的高職到現在的高職都一樣，最差的就是英文，大部分從初中英文就很差，到高中也好不了，老師的教法也很差。另外一種師大工教系畢業的，他們比較年輕、認真，都教專業科目、數學。」（許書文）

## （三）沒念什麼書，但是至少可以應付考試

張文彬提到他念高職的時候，並沒什麼在唸書，不過老師對於考試也不會特意刁難，反而會提醒學生重點，張文彬說要畢業並不困難，學校對於也學科不會特別重視，學生只要會基本的概念就好，張文彬說：

「考試的時候，我們會考說如果遇到什麼病蟲害，應該要怎麼處理。那個其實每一種蟲都不一樣，要背也背不起來，後來老師就會教說，你就先寫三個重點，反正這三個重點是一定要的，就第一要輪作不能連作，很簡單啊，輪作就是說都種一樣的東西，你如果都一直種一樣的東西，得了一種病蟲害以後，那個蟲就會一直都在，所以說要輪作，因為每種蟲吃的都不一樣，如果沒得吃牠就會死掉，不然就走了。第二就是要消毒，你中了病蟲害當然要消毒，把細菌都殺掉。第三就是要把土都翻過，然後燒掉，這個一方面也是在消毒，另一方面也是把本來種的東西的根都燒掉，這樣才會乾淨，才不會還有病蟲藏在土裡面。不管是哪一種蟲害，都是要用到這三個步驟，所以寫這三個出來，就算你根本不知道應該要用什麼農藥，至少都會有一定的分數。」（張文彬）

但是也有受訪者提到，雖然念的是高職，在一般的印象中，高職生好像都不唸書或是不喜歡唸書，可是也有用功學習的學生。如受訪者林靜怡提到他求學的過程，因為家裡經濟狀況不好，為此努力用功以取得獎學金。她說：

「我第一年念夜校，念了一個多學期後，因為夜間部回家的時間都很晚，有一次就遇到鬼，後來就辦休學。暑假過後我又想去唸書，可是之前念夜間部這樣一邊上班一邊上課實在太累了，晚上第一節上課都在打瞌睡，又要復學的時候就想去念日間部，只是那時候學校規定夜間部轉日間部要重念，不能直接轉。我爸在我堅持下就把存摺拿給我，要我去領錢。我看存摺裡面剩八千多塊，註冊要兩千多塊，那時候我爸已經得了職業病，他是做礦工的，得塵肺病，家裡的收入已經很緊。所以我去唸書的時候就覺得要很用功，為了要拿獎學金啊，要全校前幾名。學校有很多都是從初職部升上來的，學習態度比較差，不過比較用功的就會和不想念書的換位子，想聽課的就坐在前面，不聽的坐後面。同學裡眷村出身的滿多的。」（林靜怡）

從訪談中得知，這一個世代的受訪者對於在高職求學過程的印象，普遍是認為在課業壓力上，相較於高中是比較小的。而從受訪者林靜怡的訪談中發現雖然在一般的印象中高職的課業壓力相較於高中雖然比較小，但是並不表示高職學生對於課業就不重視。

## 二、教學方式

這一世代的受訪者許書文提到高職實習工廠的課程，他說：

「我們那時候的實習課，一個禮拜大概有一兩天吧，整天都在實習工廠這樣，實習工廠的節數，從以前到現在，從七節、十節、十四節、七節、再到現在變成四節，愈來愈少，三五年前一個禮拜還有一兩天的實習，

現在都沒了，只剩四節。一年級的實習就學配線，二年級學小家電修復，三年級自動控制、馬達繞線這些的。」（許書文）

而許書文也提到實習課程對未來的幫助，他說：

「要說這個對後來的就業有沒有幫助，我是覺得大概四五成吧，最主要就是比人家有優勢，有些基本的基礎，進去工廠還是要學個七成左右，可是像我畢業去應徵的時候，人家就指定要電機科畢業的，這樣我就比人家有優勢。」（許書文）

從訪談中發現，雖然高職裡實務課程的操演，無法傳授職場所需的所有技能，但是實習課程讓高職生擁有比非高職生更好的基礎，無形中也建立起高職生的優勢。

### 三、升學觀

雖然高職的設計，是讓高職生在畢業後直接進入職場工作，但是繼續鼓勵繼續升學的觀念其實仍然存在，如受訪者林靜怡提到雖然當時她的學科成績優異，但是還是有老師希望學生能夠繼續升學，她說：

「那時候有一個老師很厲害，專門在教打字、訓練打字去比賽。我們高三那年最風光了，我是中打全省第四，英打有同學拿一、二名，珠算比賽我們學校也拿前幾名。那個老師教打字很有一套，教出好幾個都前幾名。比賽完他勸我們，說學校的學科拿六十分及格就好，把剩下的時間拿來準備大學聯考，他覺得還是要上大學對以後的出路比較好，要升遷比較容易。有的老師就鼓勵我們考普考，工作比較有保障。不過我比較放不下，還是沒有把功課放下，所以剛畢業那年也沒去考。」（林靜怡）

而老師鼓勵學生繼續升學的原因，看來與文憑主義和升學主義有關，由訪談中或許可以推測，在當時求職和升遷也受到高學歷、高文憑觀念的影響。

#### 4.1.4.工作是否與高職所念科系有關

高職教育的目的之一是藉由教授特定職業所需的知能，培養不同行業所需的技術人才。而高職生高職畢業後，是否會從事相關的行業，達到這項高職教育所預設的目的呢？

##### 一、從事相關工作

如受訪者許書文高職念的是電機科，畢業之後到紡織廠去工作，從事的是

發電機修復、水電類的工作。雖然從事的工作與高職所學有相關性，但僅限於原理的相同，職場上所需的技能大部分都要重新學起。他說：

「高職畢業以後我就去紡織廠工作，他在現在的捷運萬隆站那邊，做一些工廠電機修復、水電的工作，比如說馬達燒掉了要換馬達，電燈也是，還有控制開關、變壓器那些。說到跟學校學的東西的差異，基本原理方面都一樣，但是除了基本原理以外，其他的東西就還要再學了。」（許書文）

而受訪者張文彬高職念的是農科，因為家中本來就是從事務農的工作，因此高職畢業當兵回來，就一直從事務農的工作。他說：

「我當兵回來就來種田了，一直到現在。」（張文彬）

## 二、從事非相關工作

而這一個世代其他的受訪者所從事的工作與高職念的科系並沒有直接的關係。如受訪者林靜怡高職念的是商科，高職畢業後是一邊工作一邊準備考大學。在畢業一年之後雖然回到了高職擔任電腦教室的助教，但是與當初所學並不相關。她提到：

「我在 61 年左右，回去開明的電腦教室當助教，就教人家怎麼用打卡，和我在學校學的不一樣，我待了兩三年就離開了」（林靜怡）

而受訪者羅文宜則是看報紙找了好幾個工作，也換了好幾個工作，有的工作與商科也沒什麼關係，多半從事文書類的工作，她說：

「那時候覺得可以找到工作就好，並不一定要找商科的工作，有工作就好，剛開始是去私人公司作文書，不過因為覺得薪資和工作條件不是很理想，就換別的工作做。」（羅文宜）

雖然大多數的受訪者高職畢業後剛開始從事的工作，與高職念的科系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在就業的過程中，也可能產生流動，回頭從事與當初在高職所念科系相關的工作，高職所學到的技能，可能重新發揮作用。如受訪者林靜怡在高職念的是商科，剛開始出社會工作時雖然從事過與當初所學無關的工作，但是之後林靜怡進入公營事業單位工作，從事的職務便與在校所學的商科比較有關。

而職業的流動也出現在其他的受訪者身上，如受訪者羅文宜剛出社會工作時是在私人公司做事，但是覺得在私人公司工作比較沒保障，因此繼續升學，並準備國家考試以取得較有保障的工作。她說：



「我在私人公司待了一段時間後，覺得私人公司沒什麼保障，所以就想要繼續唸書，後來考上特考，就去當公務員，這是比較有保障的工作。」（羅文宜）

而受訪者許書文做了兩年工廠的水電，但是因為覺得自己程度不怎麼夠，因此選擇繼續升學念工專，同時也提到高職與工專所學的差異，他說：

「我在紡織廠做了兩年，之後就去念亞東工專。去念二專是因為在工作上覺得程度不夠，才會覺得想再去念。我覺得在二專裡面學的東西跟高中差不多，但是就是強調原文，就是用英文書，可是程度上都差不多。同學都從各地來，有花蓮、嘉義、台東的都有。在實習課方面就比較重視實驗，像工業電子、發電機之類的實驗，要做出他的什麼曲線，著重在運作的原理、特性這些的，這跟高中就比較不一樣。」（許書文）

這一個世代的其他三位受訪者，剛離開學校時所從事的工作和高職科也沒有多大關連。雖然從訪談中發現受訪者高職剛畢業所從事的工作多半與本科系無關，但以目前的工作而言，則較為相關。由於訪談人數的限制，並無法推論這一個世代的高職生從事相關工作與否的比例為何，不過卻可以從中獲知這一個世代高職生，從事相關工作與否的原因。另一方面從訪談中，我也發現雖然高職生剛畢業的時候，不一定從事相關的工作，看似學非所用，也沒有達到高職政策上的目標——希望藉由各類科人才的培養，提供勞動力市場所需的各種人才，但是高職生畢業後，過幾年也可能因為不同的因素，而從事與本科系相關的工作，同樣的對高職生而言有利於未來的工作，只是不是直接見到立即的效果。

#### 4.1.5. 所學與未來——高職所學是否能學以致用

高職教育的另一個目的是在於培養從事某種特定職業所需的知能，以養成健全的基層技術人才（張波鋒 1988：92）。那麼高職所學是否能讓受教者得以學以致用，這一個世代不同的受訪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 一、在實務工作上比較佔優勢

對於在高職所學與工作所需技能是否能夠結合，部分的受訪者表示雖然進入職場後，技能主要是從職場中習得，但是從高職建立的基礎，相較於非高職生佔有一定的優勢。如受訪者許書文畢業後從事工廠內電機、水電維修的工作，他認為去到工作現場雖然還要再學才能勝任工作，但是基礎的東西他都已經會了，工作要上手只要幾個月就可以，不像過去師徒制的訓練，往往需要好幾年的時間。他表示：

「要說這個對後來的就業有沒有幫助，我是覺得大概四五成吧，最主要就是比人家有優勢，有些基本的基礎，進去工廠還是要學個七成左右，可是像我畢業去應徵的時候，人家就指定要電機科畢業的，這樣我就比人家有優勢。」（許書文）

## 二、懂得原理，但未必實用

農校畢業的張文彬提及，雖然在學校曾學過病蟲害防治的相關課程，在務農的過程裡，實際上需要用到農藥的時候，都是詢問農藥店應當使用何種農藥，將狀況描述給老闆聽，再由老闆建議使用何種農藥；在實務上許多東西也往往還需要再多加學習。但是在職校階段所學的東西，可以讓他在聽別人解釋一些農業相關原理的時候，比較容易能理解，不過他也提到在現實狀況裡，能理解這些原理並沒有太大的作用。他說：

「以前學校學的多多少少會有一點用啦，可是大部份還是都在後來學的，就是實際上去作的時候學的。唸書要說有差的話，就是比較有一些觀念，人家在講農藥什麼的，我會有一些概念，知道人家在講什麼，可是真的在種的時候，就都是靠實做了。其實大部份的人都是來這邊（農藥店）問看要用什麼藥而已，有觀念也沒有用。」（張文彬）

## 三、從事相關工作非常受用

而有的受訪者則認為，若從事相關工作，在高職所學到的技能，在職場上是非常受用的。如商科畢業的受訪者林靜怡表示，雖然她在剛畢業那幾年，都沒從事商科類的工作，但是過幾年進入公營事業後，擔任會計的職位，開始覺得在高職所學非常好用，她說：

「我那時候功課好，專業科目學的不錯，到現在工作都用高職學到的就很夠了。像我有時候去大學服務，也有大學生跑來找我問會計，我就教他們。我們那邊也有一個股長，他是大學會計系畢業的，可是他連借方貸方都搞不清楚，常常來問我，還跑到我家要我教他。」（林靜怡）

從訪談中得知，這一個世代的受訪者對於高職所學是否能與職場所需技能結合，達到學以致用的效果，雖然部分受訪者提到高職所學到的理論在實務尚未必受用，如張文彬的看法，同時也有受訪者表示，技術主要還是要從職場習得，但是這一個世代受訪者大多認為從高職所學到技能或原理建立的基礎，能讓他們在職場上佔有一定優勢。而受訪者林靜怡的訪談更是肯定高職能達到學以致用的效果，並表示高職所學到的專業技能，在職場上已經相當夠用，甚至比大學相關科系所學的還要實用。這樣的差異，或許與高職與大學教育方式有關。

#### 4.1.6.對高職的評價

現今對於高職地位的評價，一般而言是認為較過去來得要低，而這一個世代的受訪者對於高職地位的評價又是如何呢？從訪談中發現這一個世代的受訪者，對於高職的評價多數是肯定的。如受訪者林靜怡認為雖然去念高職，是因為考不上高中，但是並不覺得念高職是矮人一等的，她說：

「我從來都不會覺得念高職矮人一等，都是社會給高職的人加上 mark，社會上也還都以學歷來決定升遷，可是其實那跟工作能力沒什麼關係。」（林靜怡）

同時他也提到，念高職在他們那個鄉下地方已經算是相當高的學歷了。林靜怡說：

「我小時候住的地方很鄉下，國小教室都還不夠用。考初中的時候差了 5 分沒考上，到現在都還記得。那時候一班六十幾個，只有三個考上初中，加上念私立中學的，也只有五個，一隻手就數得完。我沒考上就去念平民中學，在景美，現在叫莊敬，因為家裡窮，他的學費不貴，聽說學風不錯，學生滿用功的。本來爸爸不讓我念，是外婆拿錢說一定要給我念的，她是從城裡來的，比較重視這個。我念到高職是附近的第二個」。（林靜怡）

由林靜怡的訪談中可以發現，高職地位的評價，與城鄉環境也有關係，例如林靜怡提到他生長在鄉下環境，能考上繼續升學的已經不多了。考上高職更是稀少。相對之下，考上高職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而對當地來說，高職已經算是高學歷。但是從林靜怡外婆堅持要她繼續升學或可推測，在當時相較於鄉下的城市地區，擁有高職以上的學歷會是有用的，因此才會堅持在有機會的時候，應該加以把握。

對另一位受訪者邱心儀來說，在當時能念到高職已經算是很好的學歷，因為當時念高職的人並不多，她說：

「那時候能念這個算是很好的呢，不是很多人在唸的。我是晚上去上課，白天還要上班，很辛苦的。念了一年他們就給我升班長，雖然我還沒唸完，可是他們覺得我已經算是學歷有比較好了。」（邱心儀）

從邱心儀的訪談中可以發現，在當時擁有高職的學歷，被視為是一種相當不錯的學歷，並因此由作業員升到基層管理 領班的職務。另外林靜怡與邱心儀均提及，高職的地位與學歷在當時的社會被視為是高學歷。

## 4.2. 第二世代調查基本分析

### 4.2.1. 選擇高職的原因

#### 一、考不上高中

在六位受訪者中，有五位表示，是因為高中、五專都沒考上，所以就念高職。而雖然五位受訪者都是因為沒考上高中而念高職，但是這些受訪者選擇念高職同時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

##### (一) 覺得高職以外的選擇遙不可及

受訪者游勇權認為自己的能力無法考上高中，只有去念高職，他說：

「國中畢業只有考高職，因為我覺得其他的都考不上，雖然也不太曉得為什麼要念，這個學校是離家裡比較近，念這裡比較方便，家裡也都不會管我們啊，都說我們自己想怎樣就怎樣。」（游勇權）

##### (二) 受到家庭經濟的影響

受訪者游純梅和郭文豪選擇念高職，除了沒考上當地的高中外，同時也受到家中經濟的影響，因為父母表示要唸書的話，一定要念公立學校，如果是私立的，就只好先去工作了。郭文豪說：

「念高職是因為家裡講的，就說不是念埔里高中就念高工，不讓小孩去外面唸書，因為我們家裡窮，沒有錢讓小孩去外面唸書，在外面就要住校還是通車，要多花很多錢，也覺得小孩子還不定性，怕出去會學壞。所以說考的上埔里高中就去念，考不上的話就去念高工，我是高工也考不上，就先去念高農，那個學校很好考，念一念再考轉學考轉到高工去。」（郭文豪）

而游純梅則說：

「國中畢業那時候家裡很窮，爸媽就說：如果考上私立的就不用念了，要去找工作，只能讓我念公立的，男生的話像我弟就去念埔里高工，女生的話像我就去念埔里高中的商業經營科。那時候埔里高中已經是綜合高中，所以他有普通科，也有職業類科，我就去念他的商科。」（游純梅）

而經濟的因素也限制了受訪者選擇的機會，以郭文豪和游純梅的例子來說

，當地的高中只有一所，因為家裡經濟的限制，並無法提供小孩在外就讀的額外費用，因此，只能學校的選擇僅限於當地。游純梅回憶說：

「我們家不讓小孩去外面唸書，因為我們家裡窮，沒有錢讓小孩去外面唸書，在外面就要住校還是通車，要多花很多錢，也覺得小孩子還不定性，怕出去會學壞。」（游純梅）

因此，在游純梅跟郭文豪都沒考上公立高中後，加上附近也沒有五專可以選擇，游純梅便就讀高中附設的商科，郭文豪是高工也沒考上，便先到山上的高農先去念了一年，之後再轉學到高工。

## 二、為了文憑

受訪者洪家昌說念高職的理由很簡單，就是為了一張文憑，他說：

「我念高職的原因很簡單，就是為了一張文憑，就這麼簡單。」（洪家昌）

雖然洪家昌認為就業是靠技術，而不是靠文憑，他說：「就業的話，是靠技術，不是靠文憑的」，不過洪家昌認為，社會上還是看重文憑，因此洪家昌在唸完高職工作幾年後，選擇繼續升學，他說：

「今年我有報名四技二專，升學也是為了文憑啊，畢竟社會上看重這個，可是實際上技術、還有執照比較有用。如果不是要拿那張文憑，念高職實在是浪費生命。」（洪家昌）

而對於洪家昌而言，會選擇念高職也是因為沒考上高中與專科，他提到：

「當然我也是因為高中、專科都沒考上，就去念高職了，我那時候考也是從普通高中再來高職，我選這個學校，因為只要文憑嘛，就選比較好混的學校，這個學校制服比較好看，女生又多，多到把恐龍都扣掉之後，一個男生都還可以分配到好幾個女生。反正就是為了文憑，也算是找個機會，看會認識什麼人，學是學不到什麼東西，也不曉得以後要做什麼。」（洪家昌）

從洪家昌的訪談中，我們可以發現，似乎社會上對於文憑以及技術孰重難分難解的觀點，也從洪家昌的話裡呈現了出來：對現實工作上有用的是技術，但是隨著社會上學歷普遍提高，找工作時的最低學歷要求，也愈來愈高了，也反過來使本來不打算升學的人不得不上升學的路。

而另一位受訪者曾友潛選擇念高中與文憑也有關係，他提到他出社會後，覺得國中學歷在社會上是比較低的，因此就跑去念高職。他說：

「我國中畢業以後就不想唸書了，覺得唸書好無聊，我比較喜歡去玩機器，東摸摸西摸摸的，所以畢業後就去玩機器，去做農機，一直到當兵。就是去幫人家耕田，那時候有好幾百甲的地都是我們在耕的，整個大坪頂還有台糖的地，現在暨南大學那邊也都是。當兵完之後覺得學歷好像不太夠，就跑去念埔里高中商業經營的夜間部。白天的時候還是在家裡幫忙種田。」（曾友潛）

陳傑民高職念的是商業經營科，不過曾友潛當時已經再度回到務農的工作，對他而言，高職裡面學不到實際的農業技術，就讀高職的目的，除了文憑以外，還有另一個目的，是希望學習一些新的觀念，雖然不知道他目前年淨利數百萬的能力，有多少是受到高職中學到「新觀念」的影響，但就他提到他種植的情形時，眉飛色舞的他的確擁有很多「新觀念」：

「我種田和別人不一樣，和傳統的不一樣，一般人都沒有在想，我會去思考很多，像農藥、季節、雨量，都要用新的想法去記錄、分析。我一個弟弟是念員林農工的，他們那個只是唸好看而已，根本沒教什麼有用的東西，像教農場經營，你想怎麼可能每個農校畢業生都去開農場？台灣的農業也不是大部份都是農場公司，大部份都是私人的。然後像蟲害的教學，說只有介紹蟲啦，也沒有教怎麼解決，然後用的農藥都是日本時代的，五十年前的農藥，現在根本沒有用。我弟在念的時候都被我笑。

作農的要有那個『敏感度』，就像帶小孩一樣，你看到小孩的什麼徵狀，你就會去注意，他可能長大會便怎樣，還是是不是生了什麼病之類的，要有這種敏感度。農作物也是這樣，我就是會去觀察、記錄，以後剛開始有病蟲害就會知道，就會提早用藥，這樣不但效果比較好，用量也比較省。或是說如果有消息說外面有什麼病蟲害，就要提早預防，不要等到來了才處理。」（曾友潛）

而在商業經營的概念運用上，曾友潛提到了如何節省成本，提高利潤，他說：

「用農藥我就會去找中盤的業務，因為一般農藥店是為了賺錢，他不一定會給你最好的藥，或是他自己也不怎麼懂，等到沒用作物都死光了。我會去作實驗，跟業務拿很多種要，像一個小菜蛾就有很多藥可以用，我還去書店買到一本農藥百科全書，那後來就沒有在賣了，好像是農委會還是什麼研究單位出的，我會每一種藥都試試看，看哪一個最有效，有時候市面上的都試過了，效果還是不好的話，就叫業務拿最好的要給我，其實大陸那邊他們生產很多新的藥很有效，可是我們都不能上架，可是還是會有人偷偷帶進來。農藥很重要，像 20 幾甲的地，一年農藥成本要上百萬，處理得好是不是就省了一些？我就是用一塊小一點的地方一直作實驗。

不只是農藥而已啊，品種也很重要，不同的季節要用不同品種的菜頭，有的比較適合天氣冷一點的，有的要熱一點，像我從冬天到夏天，有三種不同品種在用。也要注意天氣預報，比如有颱風要來，每次颱風來不是中南部蔬菜都損失慘重？其實有一些藥可以預防葉子被雨水打爛，可是要提前施藥啊，所以要注意氣象，不是前一天才處理。像夏天很容易有西北雨也是一樣道理。這樣子的話，別人因為颱風下雨造成什麼災情，我是可以在菜價上漲的時候賺到一筆，這就是在說我的觀念比人家新。」（曾友潛）

同時也提到要如何避免被中盤商剝削，以提高收入，他指出：

「還有一個東西就是，常常有人說農民被剝削，就是在說被中盤剝削，因為好像你不賣給他就沒有人可以賣，可是我們也可以反過來做，反過來我們這邊聯合起來，還要控制產量，這個是我退伍時去全國電子當倉儲、物流當了一年學到的，如果我們不要在大家都出貨的時候出，那就不會被中盤控制，反過來可以控制中盤。我也可以有一些內線消息，比如說南部有很多人要種某種菜了，那我就提前準備收起來。說起來農民很可憐，大家都想著說什麼東西可以賺錢，然後就一窩蜂都跑去種，等到收成的時候價格又掉下來，甚至掉到連去採收都不划算，就放著讓他爛，實在很可憐。」（曾友潛）

從洪家昌與曾友潛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發現即使同樣希望為求得較高的文憑而選擇念高職，但是背後的動機仍有差異。曾友潛是在自家的農地工作，除了覺得在當時的社會高職文憑不夠，但主要是希望學習新的觀念，運用在自家產業上。而在洪家昌是在外求職後，對他而言雖然在職場中技術比文憑重要，但是他覺得當時的社會除了技術外，更重視文憑，因此他念高職或繼續升學，純然是為了求得更高的學歷，以因應社會的需求。

從訪談中，我發現這一個世代的受訪者，選擇念高職的原因主要從考不上高中、或自認為能力不及上高中開始，而在這個原因背後，還受到不同動機的影響，而選擇念高職。

#### 4.2.2 科系選擇的原因

從訪談中發現這一個世代的受訪者科系選擇的考量主要是到主流觀念的影響，除此之外是依照受訪者的興趣和需要而決定。

##### 一、受主流觀念影響

受主流的觀念而選擇當時最熱門的科系，是訪談中受訪者科系選擇主要的

因素。受訪者游純梅和郭文豪在選擇科系上，雖然是依照家裡的決定，游純梅說：

「國中畢業那時候家裡很窮，爸媽就說：如果考上私立的就不用念了，要去找工作，只能念公立的，男生的話像我弟就去念埔里高工，女生的話像我就去念埔里高中的商業經營科。」（游純梅）

但是家裡的決定也是順著當時社會上男生學工，女生學商的觀念影響。只不過郭文豪一開始沒有考上高工，因此先到比較好考的高農就讀，一年之後再考轉學考。而受訪者陳彥柏念機工科，也是順應當時主流的想法，認為這樣在將來會比較好找工作。他說：

「我選擇念機工，在那個時候也算是主流，比較容易找工作。」（陳彥柏）

而另一個影響陳彥柏選擇機工科的原因，與他的興趣有關，他說：

「我當時對機械方面的東西也很有興趣，常常看一些和飛機、火車有關的書，所以自己也想念機工科。」（陳彥柏）

因此陳彥柏選擇機工可算是兼顧了未來出路的考量以及個人興趣。

## 二、依照興趣

而另一個受興趣影響，是最初選擇念餐飲科的游勇權，他說：

「我們家是說只要我有興趣就好，我那時候希望以後可以從事餐飲的工作，所以就選擇餐飲科。」（游勇權）

游勇權因為家長並不干涉子女的選擇，因此他選擇了自己有興趣的餐飲科，也覺得念起來很有趣。不過後來洪家昌轉到了資訊科，原因是因為洪家昌希望可以從日間部轉到夜間部，以半工半讀的方式唸完高職，不過因為夜間部餐飲科人數已滿，因此他只好轉到資訊科就讀，他說：

「我本來是想要念夜間部，半工半讀。所以高一結束後就申請轉到夜間部。可是誰知道餐飲科夜間部已經沒有名額，我只好轉到資訊科去。」（游勇權）

雖然游勇權的家裡並不要求他去打工，但是游勇權很希望能自己賺錢，因此為了能半工半讀，他還是選擇念夜間部的資訊科，放棄餐飲科，不過游勇權覺得這樣的選擇其實也還好。他說：

「餐飲科算是我的興趣，覺得念起來也滿好玩的，可是轉夜間部是想



要能白天去打工，想要自己賺錢，自己付學費，我的學費還有平常的花費都是自己付的，就是除了真的沒錢的時候跟家裡拿一點，不然都是自己賺，不想太依靠家裡，也不是說家裡有要我一定要去打工，可是就是想自己賺錢，所以沒有念餐飲也還好啦。」（游勇權）

### 三、依照需要

從訪談中發現，興趣是這一個世代受訪者選擇科系的原因之一，但並不是絕對。以這一個世代的受訪者曾友潛為例，雖然他的興趣是在農業方面，但是他卻不選擇農科就讀。一方面是覺得農校所教的在實務並不實用，他說：

「我一個弟弟是念員林農工的，他們那個只是唸好看而已，根本沒教什麼有用的東西，像教農場經營，你想怎麼可能每個農校畢業生都去開農場？台灣的農業也不是大部份都是農場公司，大部份都是私人的。然後像蟲害的教學，說只有介紹蟲啦，也沒有教怎麼解決，然後用的農藥都是日本時代的，五十年前的農藥，現在根本沒有用。我弟在念的時候都被我笑。」（曾友潛）

另一方面是因為覺得在農業經營上，希望藉助商業經營的概念，來節省成本，提升收入。對於曾友潛來說，是基於事業上的需要，選擇就讀的科系，這是訪談中比較特殊的原因。

## 4.2.3.學習過程的印象

### 一、求學過程對高職的印象

回憶起高職的生活，在受訪者郭文豪的印象裡，他提到雖然他高一念農校是因為考不上高工，但是園藝科一年的生活裡，學到如何照顧一些植物，上課的操作在於如何種植、土應當如何挖掘等等實做課程，讓他覺得相當有趣。進入公立高工之後，他提到求學的生活，他說：

「我們班的秩序是全校最差的。我在學校也沒什麼在唸書，我們那個班有一個全校最壞的，他算是社會人士了，在學校裡面的人緣很好，每次如果要打架的話，每一科都會有人出來幫他，所以我們班算是秩序比較差的。有一次白天在上課，有人在後面煮燒酒雞，用以前烤肉的那種重重的爐子，從早上就開始煮，煮到下午才好，整天教室裡面都是燒酒雞的味道，老師也沒說什麼，只要不要吵鬧影響上課就好，後來我們吃不完還拿去給教官吃。那時候我跟朋友都在玩，晚上常常一堆同學去唱歌、喝啤酒，反正就是慶祝生日那些的，平均一個禮拜大概有兩次吧，然後白天上課的

時候再睡覺。」（郭文豪）

從郭文豪的訪談中，除了可以發現他的求學態度，另一方面也可以發現老師授課的態度，比如學生公然在教室後面煮燒酒雞，教師只說要學生不要影響到上課秩序就好，並不干涉。在這裡無從判斷教師是否覺得因為教的是高職，對學科的要求相較於高中不需太嚴，因此採放任的態度，但是卻可以思考教師的態度是否反映出高職當時所表現出的評價。

## 二、學習內容與方式：實習工廠與建教合作

受訪者陳彥柏提到在高職三年的學習生活中，印象比較深的是實習課程，他說：

「我們一個禮拜五天半的課，有兩天在實習，實習內容包括鋸子、鉗工、車工、公母套等等，實習教師可能以一個學期為限，要求做出數件工件，並且依據我們作的東西打分數。」（陳彥柏）

同時對於當時學校的設備，陳彥柏感到相當值得驕傲，他強調當時他們學校的設備與其他私立學校相比，可以說是相當好的。在師資方面也是，陳彥柏也相當肯定當時師資的專業能力，他提到：

「我們學校所用的實習車床，在當時最好的是用大同的，再來是陽鐵，接下來是大新機械製造的，學校用的就是大新的，但是和其他私立學校比起來，用大新算是很好的機械了。師資方面，我們學校用的是師大工教系畢業的老師，我覺得他們真的是學有專精，懂得很多。」（陳彥柏）

不過陳彥柏也提到當時教師的教學態度和他的感想，他說雖然在實習工廠可以學到一些實務上的技能，但是學習效果如何，老師卻沒有給予回饋，而且對於學生的要求也不嚴格。他提到：

「雖然後來把工件交出去，可是老師也沒有說什麼，所以也不太曉得應該有哪些地方、要如何改進。有時候只要替教師出公差就可拿到分數。」（陳彥柏）

而陳彥柏對於教師教學態度的反應，反映出來的可能也是當時高職對於技術傳授的態度以及高職教育中技術傳遞的方式。

這一個世代的受訪者郭文豪也提到了對實習工廠的印象，他說：

「我們一個禮拜中有兩天的實習課程，在實習工廠進行，學習內容包括各種鐵製、塑膠製管路的彎曲，連接等等。」（郭文豪）

另外他也提到了建教合作的方式。他說：

「學校會有另外一些建教合作班，他們上的課和我們不一樣，他們三個月上課、三個月去工廠實習。我們的實習是去實習工廠，一個禮拜兩天，就教我們作彎管，有塑膠管還有鐵管。塑膠管要用燒的，鐵管是用彎的，塑膠管還有管子要連接，就是要用一段更大的管子把兩端連在一起。」  
(郭文豪)

而受訪者洪家昌除了提到實習工廠與建教合作的學習方式外，也提到他對於這兩種學習制度的看法，對洪家昌而言，透過建教合作學到的技能比在實習工廠學到的有用，他說：

「我們沒有真的學到什麼，如果真的要學東西，我覺得比較有用的是建教合作，不是像我們這樣上課。」(洪家昌)

而洪家昌之所以認為建教合作的方式比在實習工廠所學紮實，與兩者進行的方式有關，他提到建教合作是進入真正的工廠工作，接觸的是最新的機器，也有學長帶領學習，學習的時間較長。實習工廠並不是真正的工廠，設備也較老舊，與職場的實際的狀況是有差別的，他提到：

「建教合作就是三個月去工廠實習，三個月上課，再三個月實習，三個月上課這樣巡迴，好像整個三年都是這樣。學東西一定要去現場，這樣比較有用，學到的也都是實用的東西。比如說你每天就是在工廠工作，這是玩真的，東西一定要做到好，不是像在實習工廠裡面好像玩假的一樣，機器也都是很舊的，可能都是很古老以前的電子產品，不像去工廠裡面接觸的是最新的機器、產品，也有學長在帶你做事，一切都是真的在工廠裡面，學到的東西才會有用，畢業以後如果繼續做，馬上就可以用得到，不用重新再學，因為你都已經學三年了嘛。」(洪家昌)

同時洪家昌覺得建教合作的方式優於實習工廠最主要的一點是，畢業之後並不需要重新學習所需要的技能。

### 三、升學觀

而從訪談中發現，這個世代的受訪者都提到了學校內設有「升學班」的現象。在受訪者洪家昌的訪談裡，便提到在剛入學的時候學校便依照成績將班級分為升學班與非升學班，而不同的班級教師上課內容也有差異。他提到學校鼓勵學生繼續升學與重視升學率的狀況與作法，他說：

「我們在入學的時候有看分數，看你是拿什麼分數去報，然後會照成績去分班，老師上課就會不一樣喔，還會介紹哪些補習班什麼的，後來升學就差很多，像我們科有三班，一班有四十幾個，升學的就三十多個，二班大概五十個，才兩個升學，三班才一個升學。學校很鼓勵升學的，像

還有一種學生，他是考上省立的學校，如果他不念省立的，來我們學校念，學校就給他學雜費全免，算是優惠。學校現在都要比升學率啊，所以也是希望有成績好的學生進來。」（洪家昌）

受訪者郭文豪也提到學校鼓勵升學的狀況，他說：

「那時候學校也滿鼓勵畢業後再繼續升學的，一班大概有三四成會繼續升學，如果有興趣要升學的，就放學後會留下來唸書，老師會幫他們加強一些專業科目，因為升學考技術學院的話要考專業科目，普通科目都沒有在準備的啦。」（郭文豪）

而游純梅也提到學校為鼓勵升學，而實施分班制度，將班級分為就業班與升學班，她提到：

「學校很建議我們升學，我們的校長不錯，很鼓勵我們繼續念，我們職業類科也有分班，分升學班跟就業班，沒有硬分的很清楚啦，不過大概會分一下，就打算升學的一班，畢業後就業的一班，我算是升學那班裡面吊車尾的，放學後老師會加強一下專業科目，因為二技那種入學考試會考專業科目，那些老師在課後輔導都沒有收錢呢，都是義務幫忙的。」（游純梅）

游純梅還提到當時進入高職以前，家中的長輩告訴她說高職已經算是不錯的學歷了，但是在她進入高職後發現，高職的學歷似乎並不夠，大多數的同學還是準備繼續升學，她說：

「在念高職之前，本來想說念到高職就差不多了，而且比較沒有壓力，長輩們像姑姑啦他們都會說，念到高職很好了，算是很不錯了，家裡是說隨我們能念多少就念多少，不能念就算了，隨便我們。可是進去之後才知道不夠，學長學姊還是其他同學都會說要準備升學。」（游純梅）

這一個世代的受訪者也指出了學校設有升學班以及鼓勵升學的作法。從他們的訪談中得知，高職生選擇進入升學班就讀一部份是入學的時候就被為求升學率的學校按照成績編班，如洪家昌提到的：

「學校裡面也有像是升學班那種，沒有特別在說，可是進去的時候就會照成績去編班。」（游勇權）

除了在入學開始就被依照成績分發到升學班外，從訪談中得知，另一個影響高職生選擇繼續升學的原因是受到個人興趣的影響，受訪者郭文豪表示：

「那時候學校也滿鼓勵畢業後再繼續升學的，一班大概有三四成會繼續升學，如果有興趣要升學的，就放學後會留下來唸書，老師會幫他們加

強一些專業科目，因為升學考技術學院的話要考專業科目，普通科目都沒有在準備的啦。」（郭文豪）

而另一方面，在唸完高職後，受訪者也可能選擇繼續升學。如受訪者洪家昌表示他高職畢業後，仍有升學的打算。一方面是因為他覺得在社會找工作還是跟文憑有關，而另一方面則是發現自己所從事的工作在未來對工人的需求會減少，因此覺得自己應該另作規劃，而選擇繼續升學。他說：

「我自己有做過工廠、水電的，冷氣裝修，配線這些，火鍋那些是打工的，現在在做鑰匙，像光陽機車的鑰匙，有九成以上是我們做的，不過這一行很多都外移到大陸了，我也在想說以後應該還要另外有打算，所以才去報名考試四技二專。」（洪家昌）

從這一個世代受訪者的訪談中我們可以發現，高職在這一個世代裡，繼續升學的觀念較上一個世代受重視，從中或許可以反映出高職學歷在這一個世代相較於上一個世代已經不算是高學歷的象徵。而從洪家昌的訪談中，我們可以發現產業的發展與對人力的需求，也是影響高職生選擇繼續升學的原因之一。

#### 4.2.4.工作是否與高職所念科系有關

在這一個世代所訪問到的受訪者從事的工作與跟他們在高職念的科系都沒有關係。背後的因素也各不相同。受訪者郭文豪剛開始念的是農藝科，後來轉念電工。但是畢業之後，在造紙廠工作。他說：

「我現在紙廠工作，在顧機器，那一天二十四小時都要有人顧，紙漿一直在作，不能停，所以我們是三班制，要輪班的，我等一下就是要去上十二點的大夜班。這個工作跟我學電工就沒什麼關係，去了就有人教，一天學一些，慢慢就會了。」（郭文豪）

郭文豪提到他的同學從事電工工作的並不多，他說：

「我同學有在作電工的大概不到十個。」（郭文豪）

至於為何從事相關工作的同學不多，郭文豪指出和市場需求有關，勞動力市場並沒有提供足夠的工作量，供給大於需求，他說：

「因為找不到那麼多可以作，因為你如果不是自己出來作，就是要跟著別人，自己出來作要有錢開，跟著別人可能一天一千三，作的多也沒有用....主要是要有工作，你如果太多人在作這些，就沒那麼多工作，通常就像人家蓋房子、還是家裡在改，可是沒有那麼多的工作，通常就需要看找

到什麼工作就作什麼。」（郭文豪）

而訪談中比較特殊的理由是由受訪者陳彥柏所提出的，陳彥柏高職的時候念的是機工科，但是他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卻是電子作業員，他的理由很特別，他說因為他不想過著「每天都把全身弄得髒兮兮」的生活。陳彥柏說：

「我高職的時候，念的是機工，三年級的時候我們都要去實習工廠，每天手都被油漬弄得髒髒的，連指甲都有，回去都要洗很久。我很寶貝我的手，你看我現在手的皮膚還不錯吧。我那時候就想我找的工作一定不要是這方面的。所以我第一個工作就是去電子工廠當作業員。因為這樣子手才不會弄髒。」（陳彥柏）

#### 4.2.5.所學與未來 高職所學是否能學以致用

這一個世代的受訪者從事的都是與高職所念科系無關的工作，那麼他們工作所需的技能從何而來呢？

這一個世代的受訪者洪家昌現在在馬達工廠打工，他提到工作的內容和他高職所學（資訊科）無關，所需要的技能是從職業現場邊做邊學的。他說：

「我現在白天打工在馬達工廠，做抽水馬達的，工廠的東西就是去工廠才學的，也不用學很久。」（洪家昌）

而對於技術，游勇權有自己的看法，他提到有些工作，雖然不需要學習技術，薪資也較高。但是也正是因為沒有技術，如果公司要裁員的話，比較容易被裁掉。他提到：

「工廠也有坐辦公室的工作，就是在辦公室裡面打字，那種的薪水比較高，可是如果裁員的話比就容易被裁掉，因為他們沒有技術，誰來都可以做，所以雖然我算也會打字，可是不會去坐辦公室。」（游勇權）

而畢業後在電子工廠擔任作業員的陳彥柏也提到，在他們工廠作業員並不需要什麼技術，也不用念到高職，國中畢業就可以了。同樣的也提出了對技術的看法。

#### 4.2.6.對高職的評價

雖然在長輩的眼裡，擁有高職學歷已經算是不錯的。但游純梅提到在進入

高職之後發現其實高職學歷並不算高，她說：

「在念高職之前，本來想說念到高職就差不多了，而且比較沒有壓力，長輩們像姑姑啦他們都會說，念到高職很好了，算是很不錯了，家裡是說隨我們能念多少就念多少，不能念就算了，隨便我們。可是進去之後才知道不夠，可是進去之後才知道不夠，學長學姊還是其他同學都會說要準備升學。」（游純梅）

曾友潛提到他覺得念農校有一個唯一的作用，就是能擁有以農創業的資格。他提到：

「念農校有一個作用啦，就是李登輝那時候說要有『八萬農業大軍』，就是如果是農校畢業的，在三十歲以前，好像可以有個幾百萬創業，像我弟畢業後其實也有這個資格，只是我們沒去用，現在是我跟我弟出來自己做，沒有再跟家裡一起。」（曾友潛）

而對於因為想要拿文憑而念高職的洪家昌來說，他說：

「如果不是要拿那張文憑，念高職實在是浪費生命。」（洪家昌）

他的理由是因為他覺得他念的科系，在高職訓練的方式與所學並無法應用在職場實務工作上。他說：

「像學英文數學，根本就用不到，電子學也是差不多，沒興趣，要職訓那種樣子學才比較有意義。去念五專的也是一樣啊。應該是想學的人再去學。」（洪家昌）

同時認為只要學習專業科目就好的，普通科目在職場上因為用不到，所以不需要花太多時間在上面，以免「浪費生命」。他說：

「然後學的科目就像汽修、電子那些的科目就好，不需要去念那些普通科目，沒用，就看你是哪一科的，就學那科的專業科目就好了。」（洪家昌）

不過洪家昌表示如果只有高中階段畢業的話，高職所學到的要比高中來得有用。

### 4.3. 第一第二世代差異初步比較

第一、二節是第一世代與第二世代基本調查的分析，本節則對兩個世代提出基本的異同作比較。其異同如下表所示：

表六：第一第二世代田野初步分析對照表

	第一世代	第二世代	相同處	相異處
就讀高職的原因	一、覺得考上高中遙不可及。 二、沒考上高中或比較好的高中。 三、就業後發現學歷不夠而繼續升學。 四、性別因素。 五、選擇有所限制	一、考不上高中 (一) 覺得高職以外的選擇遙不可及 (二) 受到家庭經濟的影響 二、為了文憑 三、覺得學歷不夠高 四、選擇有所限制	一、高職是高中的次等選擇。 二、為取得較高的學歷，以利升遷。	性別因素的影響。
科系選擇的原因	一、受當時觀念影響，選擇熱門科系。 二、與學校類型有關。 三、性別因素。	一、依循主流觀點 二、依照個人興趣 三、因為事業有需要 四、性別因素	受主流觀念的影響 性別因素	
對學習態度的印象	一、學業壓力小、活動多。 二、功課自由、要求不多。 三、雖沒念什麼書，但是至少可以應付考試。	學校對學科的要求不嚴。	相較於高中，高職的課業壓力比較小，對學科的要求也不高。但也有用功唸書的學生。	
升學觀	老師鼓勵學生繼續升學。	學校鼓勵升學，有明顯劃分為升學班跟就業班的現象。	皆存在升學主義的觀念。	第二世代升學現象比第一世代嚴重



工作與科系	從事相關與非相關都有。	這一個世代的受訪者所從事的工作與高職所就讀的科系無關。	選擇非相關工作共同的原因都與市場需求有關。	
所學與就業	一、在實務工作上比較佔優勢 二、懂得原理，但未必實用 三、從事相關工作非常受用	工作技能是從職業現場邊做邊學而來的。	高職所學的技能，讓受訪者比起非高職生擁有比較多的基礎概念。	第二世代的技能多從職場上習得。
對高職的評價	高職等同於高學歷	高職已不代表高學歷	高職學歷是必須的	第一世代高職等同於高學歷，在當時就讀高職的並不多。而在第二世代高職成了基本的學歷。相較於第一世代，高職的地位更低落。

#### 4.3.1.選擇就讀高職的原因

從這兩個世代的訪談中得知，這兩個世代的受訪者選擇就讀高職，相同的地方主要是因為考不上高中，而背後共同的因素之一是受訪者認為依照自己的能力，加上當時高中有限，並不容易考上。而考上之後一定要上大學，不然高中畢業未來的出路反而不如高職。而其他影響受訪的選擇念高職還包括為求得更高文憑、家中經濟因素影響等原因，其中比較值得一得的是，選擇機會有限的因素。在第一第二世代都提到，因為所處的環境只有一家高中跟高職。考不上高中就去念高職，不然就去工作，是當地很自然的想法。這也使影響受訪者選擇念高職的原因之一。

#### 4.3.2.影響選擇科系的因素

在這兩個世代中，當時社會的觀念是影響受訪者選擇科系的主要原因。亦即受訪者優先選擇的科系與當時熱門的科系有很大的關係。而相異的地方比較

值得一提的是事業上需要，有的受訪者是因為希望在事業上開拓新的視野，以新的方式經營而在工作多年後選擇升學高職，而且念的是不同領域的東西。。另外第二世代受訪者所念的學校多半綜合了各種類別的科系，如同時包含商科、資訊科等不同領域的科別，受訪者的選擇較多。而從第一世代的訪問中得知，有的學校只包含一個領域，如農校。我們也可以發現，高職在發展到第二世代，已有科系多元化的趨勢。

#### 4.3.3.學習態度與要求上

兩個世代同樣都提到了念高職相對於念高中課業壓力較小，學校對於學科的要求並不高。雖是如此並不代表高職學生相較於高中生就比較不重視學業，尤其是有升學打算的高職生，在課業上也是十分重視學習的。

#### 4.3.4.教學方式

這兩個世代的受訪者都提到了高職中技術如何透過實務課程的傳授。除了都有實習工廠外，第二個世代有的受訪者還提到了建教合作的方式，並且認為建教合作比在實習工廠可以學到更實用的技術。因為實習工廠是設立在學校內，而建教合作是在工廠裡實行。在學校裡的實習工廠在設備與工作環境上和實際的工廠狀況都有落差。受訪者表示在實習工廠學習技術，到了職場後還要從頭學習一遍。不像透過建教合作的方式，若畢業後繼續留在原廠，也不必從頭學起。

#### 4.3.5.升學觀

雖然高職當初設立的目標是希望透過培養各領域所需的專業人才，提供勞動力市場市場所需的人力，也就是在最初的設計上，高職生畢業後主要是投入職場，而非是以升學為主。然而從第一與第二世代的訪談資料中發現，升學主義的觀念對這兩個世代有一定的影響，尤其是對第二個世代受訪者的影響。第一第二世代的受訪者的學校或老師都鼓勵受訪者繼續升學，兩個世代的理由都是認為高學歷與高文憑對於學生在未來求職上相對於高職有較大的保障。第一個世代，想要升學的學生是透過高三科目以及格為主，全力衝刺大學聯考科目，增加學科能力。而從第二個世代的訪談中發現，高職比起第一代又更加的重視升學率，甚至將班級分為升學班與就業班。有的學校是依照學生個人的興趣

分班，而有的學校為了提高升學率，在一開學就依照學生的成績加以分班，加強輔導。由此或可推論在第二世代，高職的目的已偏離培養基礎技術人才，升學導向現象嚴重。從中也可以發現，在第二個世代高職的學歷已不像第一世代一樣是一種高學歷的象徵。

#### 4.3.6.工作與科系

雖然在田野分析中我分析了兩個世代的受訪者高職畢業後是否從事相關的工作。但是，高職生畢業後從事的工作是否與當初念的科系有關，本來就不一定。而這裡之所以要分析受訪者是否從事相關的工作，其實是為了探討背後的原因。也就是說，依照高職設計的目的之一，是為了培養市場各領域所需要的專業人力。然而從訪談中得知，有些高職生畢業後並不是從事相關的工作。如此便與當初設計的目標相異。是什麼原因造成高職生畢業後沒有從事相關的工作，是我對高職生是否從事相關工作這一項分析，真正要分析與探討的。

從訪談中得知，這兩個世代的受訪者在畢業後之所以從事與高職所念的科系不同的工作，主要的原因與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有關。這兩個世代的受訪者都提到了，勞動力市場並沒有提供相同足夠的工作機會，也正是因為如此，這些從事非相關工作的受訪者只好選擇非相關工作。正如受訪者羅文宜說的：以找到工作為優先考量，至於是不是相關科系並不是最重要的。

#### 4.3.7.所學與就業

高職生在進入職場後，他在高職所學到的技術是否夠用？從兩個世代的受訪資料中發現，第一個世代的受訪者有的認為在高職所學到已足夠應付職場所需要的技能。而其他的受訪者雖認為在進入職場後仍需要在從職場中加強所學，但是高職所建立的基礎，讓受訪者在進入職場後比非高職生還佔有優勢。雖然第一世代的受訪者也提到高職所教的原理在實務中未必受用，但是因為在高職建立了基本的概念，在學習相關的知識或技能的時候，也因為較容易理解，而縮短學習的時間。雖然第二世代的受訪者所從事的工作與他們在高職念的科系無關，看似他們在高職所學的技能無法應用到職場上。但是由於訪談人數的限制，因此無法推測這一個世代的高職生在校所學的技能是否能符合職場需要。

而第一世代與第二世代的受訪者，同時提到的雖然在學校裡有教授技能，但是職場所需的技能，主要還是要從職場中再加以學習。在高職學到的技能及

相關知識，主要是讓受訪者能有基本的概念。而從訪談中得知，第二個世代受訪者技能的學習相較於第一個世代，有五成是要從職場學習，第二個世代的受訪者表示絕大多數的技能主要是從職場中所來的。從本研究中受訪者的訪談可以發現，高職生在職場所需的技能，並不是全然從學校裡就可以完全學習到，還是必須在工作現場中增加所需的技能。只是從學校與從職場學習到的技能比例，隨著工作性質和學校教育而有所差異。

#### **4.3.8.對高職的評價**

從訪談中得知，在第一個世代，由於當時高職並不多，念高職的人也不多，因此高職被視為是高學歷的象徵。而從第二個世代受訪者的訪談資料中得知，在第二個世代的高職，相對於第一世代，並不認為是一種高學歷的代表，高職甚至被視為是一種基本的學歷。為何高職地位與評價會有這樣的轉變，是本論文要探討的主題之一。

本章針對兩個世代的訪談作了初步的分析，所呈現出來的是兩個世代表面上所看到的現象，也就是兩個世代的差異。下一章將對這些差異背後的因素，做更深入的探討。

## 第5章 高職生技能之社會地位

根據高職的目的是培養基層技術人才而言，我們要解釋高職的「沈淪」，直覺想到的就是，現在高職生在技能的學習上，比過去的高職生還要遜色許多，因為學得不好，所以沒有足夠的技能，因此在就業的時候，所學的技能不是不敷使用便是派不上用場。然而就第四章的田野資料以及比較，發現兩個世代之間，對於技能在工作現場上的應用，均呈現不足的現象，也就是兩個世代的高職生，其技能在實務上同樣仍須進一步訓練方能應付所需。因此，對於技能訓練上的差異，要用來解釋高職的「沈淪」，是不夠的。那麼，我們要怎麼解釋這個現象？

### 5.1. 所學技能不足

從第四章的世代差異比較上，我們可以發現，第一世代跟第二世代之間，對於技能在工作上的實用與否，都表示均需要再加以學習，也就是說，在高職學校所學的技能，並不足以應付工作現場的需要。這可以分成幾個部分繼續探討：學校課程設計狀況、學生習得技能狀況、以及實務界認為他們需要怎樣的人才。

#### 5.1.1. 課程設計部分

在第二章時曾介紹到台灣職業教育政策的演進。1945 年到 1950 年代之前，台灣社會仍在適應「改朝換代」的事實，政府對教育上重視的是推展國語教育以及三民主義思想，未特別重視職業教育（歐素瑛，1997：58）。1950 年代美援進入台灣之後，針對職業教育的改革，推行了「單位行業訓練」以及設立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系。

在單位行業訓練設計之初，產業界對於職校畢業生頗不滿意，造成職校畢業生失業現象（參見安後暉，1998：31），因此常常要求職業教育應和產業需求配合。若是以學校課程能配合市場需求來看，再規劃設計課程之前，對產業進行職業調查似有必要，而這也是美援顧問所提出的建議（參見方俊育，2000：61）。美國針對單位行業訓練所做的職業調查，重點在於瞭解各個行業的工作內容，之後進行詳細分析，將分析所得轉而設計成學習的課程（Thompson，1973：165-168；整理自方俊育，2000：61-62）。也就是說，在這裡單位行業

訓練設計之前進行的職業調查，主要並不只在於瞭解市場上對各種行業或人才的需求為何，更進一步在於深入瞭解各行業詳細的工作內容，以將之整理、分解、組合成利於職業教育內（而非工作現場）教授的課程<sup>22</sup>，如此一來，在理想上職業學校所培養的人才，應該就較能夠符合現實所需的技術；而在職業學校內分類設立科的依據，也是從此而來，有別於在此之前的科別設立方式，乃是採取類似大學分科的方式<sup>23</sup>。然而即使是看似如此符合市場需要的設計，還是面臨了所學不足的問題。當時為了強調職業學校所培養的技術人才，設計了「技藝競賽」的制度，鼓勵職校學生參賽，參賽者除了是校內技術優良者之外，更在參賽前加以密集訓練，然而這種在技術方面的「菁英」，看在專業技師的眼裡，仍然相當不足<sup>24</sup>，因之，以較大型的企業而言，便設有自己的技藝人員訓練班（安後暉，1998：172）。

1955 年開始實施的單位行業訓練，經過十年之後，當初推行最力的首任師大工業教育系主任顧柏岩，曾提到單位行業訓練課程的幾項缺失，他認為社會上並沒有全力推動單位行業訓練，並受限於經費，使部分學校在推行上發生困難（顧柏岩，1966a），另一個問題則是受單位行業訓練的畢業生，就業率有下滑趨勢（顧柏岩，1966b）。然而這樣的制度，在 1962、1964 來台考察的美國、挪威職業教育專家看來，工職教育仍有學制、課程、就業各方面的種種問題<sup>25</sup>，1970 年來台考察的西德職業教育專家，則認為高工太過於注重理論而不夠偏重實習，因此職校畢業生就業時仍須經過一定的訓練<sup>26</sup>。事實上我們以單位行業訓練的操作過程來看，其中一個關鍵在於進行職業調查的時候，因為課程的根據在於此職業調查，因此若要使職校學生能符合市場上的需要，勢必經常性地反覆進行此類調查，分析各行業之變化，並更動課程設計，方能切實因應市場的變化。然而事實上，單位行業訓練理念在群集課程實施之前，主宰台灣職業教育近三十年，其間僅於 1964 與 1974 年曾經對課程做過兩次修訂，進行科系、課程與實習的一些變動（方俊育，2000），由此觀之，即使高職在教學

---

<sup>22</sup> 林志成研究台灣工具機業的技術形成過程，認為技術是和特定機器設備和生產組織產生聯繫的，例如特定的機器、合作的同事以及工作方式和文化等，都是其中重要的部分，離開這個情境，可能讓一位技術精熟的技師無法發揮其技術林志成（1996）。若從這個角度而言，單位行業訓練的方式，在職校中試圖模擬出現實的情境以進行教學，但是絕不可能模擬出現場的人際關係，或是師徒制等等，那麼職業學校將不可能達到技術訓練的目的。不過方俊育認為技術有其普遍性與流通性，否則技術先進的國家，將不可能輸出技術到較為後進的國家（方俊育，2000：72）。

<sup>23</sup> 關於單位行業訓練更詳細的介紹請參見方俊育（2000：61-67）。

<sup>24</sup> 顧柏岩提到在 1957 年機工技藝競賽中和裕隆工程師的對談，工程師表示最優秀的技藝競賽得獎者，還不一定能考上裕隆的車工。載於顧柏岩（1958），轉引自方俊育（2000）。

<sup>25</sup> 參閱鎮天錫等著，人力政策之形成與實施，行政院經建會編印，1978 年四月，p. 16，轉引自王自和，民國五十年代後中德工職教育合作的回顧與前瞻，世界技術職業教育改革動向。

<sup>26</sup> 行政院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人力發展工作小組編印（1970）《西德職教專家對我國職業教育之改進建議書》，台北：經合會。

方面，均能按照最初規劃並達成預期目標，在大約每十年才做一次修正的情形下，應該免不了在社會經濟環境有所變化時，造成與實務界之間的差距。

重視職業調查的精神，在 1980 年代面臨職業教育課程改革時，同樣發揮了作用。當時改革的方向，主要有德國式的階梯課程與美國式的群集課程兩種理論引進台灣，在相關決策的擬定過程當中，除了對工業教育界進行調查以外（莊謙本，1980），也對產業界進行可行性的調查（張良德，1980；黃麒麟，1980）。雖然對於課程選擇上，當然會有其他因素的影響<sup>27</sup>，但是仍是考慮了勞動力市場的需要。

對於幾乎十年才修訂一次課程與科系的高職而言，也有自己一套適應社會需要的作法。謝小苓等人曾針對高職以及附設職業類科的高中，進行學校類科設立及變遷過程的研究，研究中顯示有 67% 的職校曾經變動招生類科，這其中絕大多數甚至經歷多次變動，她們認為，「這種現象顯示出職業學校為了配合人力規劃的要求以及民眾需求的改變（招生考量），所付出的努力」（謝小苓等，1996：28）。其中人力規劃政策對高職的影響，以公立高職負擔此政策性任務為主，私立高職較未受到影響；「私立職校則較能掌握社會脈動，靈敏地調整招生類科」（謝小苓等，1996：40）。也就是在高職方面，尤其是私立高職，由於受到國家的規範較公立高職為小，使得私立高職有更大的彈性面對勞動力市場，並且的確做出頻繁的反應。

對於高職生學習技能的主要來源——實習課程而言，高職教師受訪者許書文提到，現今實習課程的時數，已經從過去的每週兩天減少到每週四小時，就學習技能而言，實習課時數的減少，直接影響技能的學習：

「現在學的（技能）比較不實用，因為實習已經少很多了。那如果說要在二專裡面教，可是那些教授會不會都還是個問題，那也有可能教授不一定放得下身段，會不肯教。」（許書文）

許書文擔任高職教師二十餘年，大多時間擔任實習課程的技術教師，他提到的這個問題，其實已經是高職教育應該走向那個方向的問題了。但是單就技能的學習來說，如果教育單位採行綜合高中的理由，包括了認為可以將技能的訓練交由專科程度以上來執行，就一個技術教師的立場，是認為會有很大的問題的。

---

<sup>27</sup> 例如方俊育便認為，台灣戰後工業職業教育的發展，其過程受到技術決定與政治力兩者的交互影響。以德式階梯制或美式群集課程的選擇而言，當年便加入了現實外交因素的影響：當時剛好遇上西德和中共建交，因此使得西德對我國職業教育的援助因而中斷，甚至連最初我國和西德在職業教育上的交流，也牽扯到我國希望藉由多方交流，而有助於保留聯合國席位的問題（王自和，1982；方俊育，2000）。

至於對於所學的技術和工作現場的差異之所在，方俊育有下列解釋：

實習工廠中訓練出來的技術永遠無法趕上產業界的需求，而在一些工廠中特殊的機器設備下，老師傅的長年累積下獨門技藝更是工職學生無法比擬，所以嚴格說來，學生於實習工廠中的技藝專精程度，不及產業界實際工廠裡的技藝工人（方俊育，2000：77）。

就他的說法看來，以實習工廠方式來訓練技能的高職教育，免不了造成所學與實務有差距的結果。

### 5.1.2.高職習得技術狀況

第四章曾經提到不同世代間高職生在學校所學的技能與進入工作現場後的差異之比較，在此必須提到的是，要比較高職生學校所學的技能與工作現場上的差異，應以所從事的職業應和高職所學類科相關為限，否則若是並未從事相關工作，那麼所學的專門技能自然容易讓受訪者認為沒有用處，如此無法比較出高職所學的技能和工作現場上的差異。但是在從事不相關工作的情形中，可能反過來要問的問題是，為什麼經過三年學習之後，高職生從事的是和學校所學不相關的工作？是因為所學真的無法使用的緣故呢，還是有其他的原因？

在不同世代的受訪者當中，均有人所從事的工作和高職就讀科系不太相關。雖然就目前的現職來觀察，第二世代受訪者的現職和高職就讀的科系均不相同，第一世代受訪者則看起來似乎較為相關（還是有一位完全不相關），但是從第一世代受訪者在畢業後找工作、換工作的經驗裡，仍然可以發現到，受訪者並不是順順利利地一開始就從事現在的工作，而是經歷了許多不同的工作，其中過程裡也曾擔任過可算是幾乎毫不相關的工作（如學商的羅文宜擔任過盲啞學校的代課老師，林靜怡回到原學校擔任電腦教室助教，工作內容為協助上電腦課的同學「打卡<sup>28</sup>」），因此，並不能說第一世代從事的工作就比較和高職就讀的科系相關。而這些受訪者為什麼會從事這些和所學沒多大關係的工作呢？最常提到的原因是「工作不好找」，而這句話也可以包含兩層意涵，第一層意涵是，要找相關的工作，不是件容易的事；第二層意涵，則在於令人「滿意」的工作不好找<sup>29</sup>。因此，「工作好不好找」在現實上是凌駕於工作和所學

---

<sup>28</sup> 當時的電腦需要使用打洞的卡片執行程式。

<sup>29</sup> 羅文宜憶及父母（均為現年八十歲以上）曾經說過，不論在哪個時候，工作都是不好找的，過去和現在找工作上的困難，並沒有太大的差別。講到這句話的時機，是在訪談中受訪者提到畢業後換過許多工作的時候，當時受訪者在不同的工作機會裡，曾有個以優秀成績考上紡織廠，擔任生產線作業員的工作機會，但是她因為覺得生產線上的工作過於單調乏味，且多



是否相關之上的。

第二世代受訪者其實也有類似的現象，受訪者目前從事的工作，和高職科系並無多大相關，然而這幾位受訪者同樣有轉換許多工作的現象，在轉換過的工作之中，並不乏曾經從事過和高職科系相關的行業，然而為什麼會換工作呢？有的受訪者是因為有機會從事自己更有興趣的工作<sup>30</sup>，或者就是「不想做」相關的工作<sup>31</sup>；然而在這之中，「能找到工作」仍為最主要的考量，在這個情況下，一個是勞動力市場容納不了這麼多人<sup>32</sup>，另一個是遇到工作不滿意轉換工作時，不能太要求一定要找到相關的工作。就這方面而言，兩個世代均有相似之處。

另一個並未從事相關工作的原因，是在於已經有了自己固定的工作，而在就讀高職後，也並未轉換去從事相關工作，這部分現象在兩個世代受訪者同樣都存在<sup>33</sup>。除此之外，在第一世代還包含明顯的工作上的性別歧視因素，致使工作必須中斷：在當時除了教師及公務員以外，一般私人公司，大多規定女性婚後或是懷孕後即不得繼續工作<sup>34</sup>。

上述段落論及當我們問到高職所學和工作現場的差異時，應先考慮到的是，從事的工作是否和就讀科系相關的因素。在兩個世代受訪者裡，都有工作和所學不相關的現象，造成不相關的原因之一，在於相關工作找尋上的困難或是不滿意，甚至考慮升學者，也有由於對當時工作不滿意，希望提高學歷有助於找到更理想的工作。接下來要討論的是，學校所學跟實際工作上的差異，以及此差異如何彌補。

多位受訪者表示，在高職階段，學校會要求通過基本技能檢定才能畢業<sup>35</sup>，例如在工科部分，一般便是要求丙級證照<sup>36</sup>，商科的話便要通過珠算三級才

---

為國中、小學歷者從事的工作，因此並未前往。然而羅文宜在其他從事的工作裡，雖然有的工作內容和所學較為相關，但或是覺得沒有成就感、或是覺得工作對生活上的保障不夠，因此仍然常常在「想換工作」的狀態中。

<sup>30</sup> 游純梅目前從事安親班與兒童美語的工作，雖然和商科無直接關係，但和小孩相處卻是她相當感興趣並駕輕就熟的工作。

<sup>31</sup> 陳彥柏就讀機工科，但是他因為不希望過著「每天都髒兮兮」的日子，因此找了電子工廠作業員的工作。

<sup>32</sup> 郭文豪提到，若是所有的高職同學都去當水電工，也沒有那麼多工程可以包。

<sup>33</sup> 柯媽媽就讀職校前便在電子工廠工作，就學期間仍然半工半讀；曾友潛本來從事農機代耕以及種植自家田地的工作，畢業以後也沒有另找工作。

<sup>34</sup> 李夏玉的高職同學裡，除了少數在學校或公家機關工作者，其餘的都在結婚或生子後成為家庭主婦，便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sup>35</sup> 為了拉近高職畢業生與社會上所需人才的距離，教育部在 1974 年開始辦理第一次機工科應屆畢業生的技能檢定，但是此舉反而造成高職在教學上變成以通過技能檢定為導向，因此教育部在 1982 年開始不再鼓勵學校辦理在校生的技能檢定（方俊育，2000：136）。

<sup>36</sup> 有的學校更標榜必須取得乙級證照才能畢業（謝小苓等，1996：150）。

能畢業。按照一般對於人力結構劃分相應於相對學歷的方式，通常高職學歷會是基礎技術人才這一層，往上為更高階技術，往下為非／半技術（馬道行，1976；方俊育，2000）。以專業證照分成甲、乙、丙三級而言，高職生取得的丙級證照理應算是基礎技術人才的等級。由此觀之，照說高職是達到了規劃中的培養基礎技術人才的目標才是。

然而，兩個世代的受訪者均有人表明，學校所學在實際工作的時候，即使工作和學校的科系相關，還是需要相當多的學習才能勝任工作<sup>37</sup>。在這裡，我們可以先參考一下工廠管理者在這方面的經驗。受訪的工廠管理者黃樂典，在1970年左右進入國內某著名石化企業，擔任基層管理職位，迄今三十年的歷史，逐漸升遷到中高階主管的職位，在他工作超過三十年的歷程當中，不管過去或現在，不論招募來的新進員工原先具備怎樣的背景或能力，工廠裡在招募工人之後，都會從頭培訓起，一步一步從基本開始教起，以適應工廠內的需要，因此他也不認為過去和現在的高職生，在工廠內的技能部分有什麼差異：

「我大概也工作了三十年，如果要說以前的高工畢業生跟現在有什麼差別，有一個啦，現在的人比較懶惰，這個跟以前的人比較不一樣。如果是說他們的技術的話，其實對我們來講，不管你是從哪裡來的，進來工廠就是要全部從頭學，我們都是從頭開始教的，不管你以前會的是什麼東西，你是什麼科系的，進來都是再從基本的教起，就算是三十年前也是一樣啊，從以前到現在都是這樣，應徵錄取之後就是要從頭教，因為工廠就是跟外面不一樣，跟學校裡面很不一樣，很多東西都要進到工廠以後才學得到，每個工廠用的機器又有不一樣的地方，我們都要從頭教起。所以我都認為，高工要學東西的話，一定要到現場去學才有用，關在學校裡面學不到東西。」（黃樂典）

也就是說，所學與實務的差距，在這裡有兩個部分：一個是學校跟工廠實際環境的差異，另一個是在工廠之間也有使用機器不同的狀況。

回過頭來講高職生受訪者，在世代差異比較時，曾提到過第一世代受訪者較第二世代覺得學校所學在工作上較能應用得到，這裡所說的學校所學，包含了實習課所學與一般課程所學<sup>38</sup>。這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來看，一個是對自己在高職學習狀況的印象，另一個是實際就業之後所學與實務差距。前面在世代差異比較的時候，曾提到受訪者對於高職期間學習上的狀況，常常會表示說「沒

---

<sup>37</sup> 陳信行的研究也顯示，當頭家的人還在黑手階段的時候，在工廠內主要以學習技能與培養人脈為主（Chen, 1999），亦即在工廠內的技能學習是相當重要的一個部分。

<sup>38</sup> 許書文提到的電工作，有用的部分主要在於實習課所學的技能；林靜怡多次提到的，則是會計學知識。

什麼在唸書」，亦即對於學習狀況的表達，著重在知識的部分，雖然高職課程原本的設計便不是要偏重於知識的學習。對於學校學習<sup>39</sup>的這種印象，也會影響到一般對高職學生的印象：如果高職生都表示自己沒學到什麼，那麼不管實際上有沒有學到，都很容易會讓人認為「高職學不到東西」。再說到所學和實務的差距，剛剛有提到首先牽涉到從事非相關工作的因素，這當然會讓高職生覺得學校所學沒用；這裡的「沒用」當然也會再次加強了「高職學不到東西」的印象。但是這不表示世代間對於技能上的傳授沒有差異，而是要表達從訪談中所看到的其他因素。

### 5.1.3.實務界要求

雖然就教育學者而言，職業教育很直接地以立即能就業作為導向，似乎是一見把人當工具看待的事情，不過對實務界的人而言，不管是哪一種學歷、或者受雇者的背景為何，最理想的狀態應該是，一進入公司馬上可以投入工作。以近年來相當熱門的企業管理碩士 MBA 來說，雖然一般而言「碩士」理應從事的是理論的研究，但是 MBA 課程往往以實務作為號召，甚至在課程中規定要有一定時間的實習方能畢業，也就是 MBA 極為重視和實務界的聯繫。在大學方面而言，過去我就讀某私立大學時，當時的校長在各種集會場合，最喜歡提的事情，便是企業界如何如何地喜歡用該大學的畢業生，他一再強調該大學要培養出企業界讓企業界愛用的人才，後來有一年天下雜誌針對企業界調查最喜歡用哪個大學的畢業生的時候，該大學名列私立學校首位，可想而知這位校長是如何的高興。詭異的是，這所大學進校門後第一棟建築物的玄關牆壁上，刻著好幾行大字，其中上面寫著，學校辦學的教育宗旨，是「全人教育」。

理想上是這樣，不過現實上職業學校的畢業生，到了工作現場還是得花相當的時間訓練，但是對此，雇主或管理者自有因應辦法。受訪的工廠管理者黃樂典，認為學校只要教到最基本的東西就好了，真正工作上所需的技能，都交由現場的訓練。能有別於「一切從頭開始」者，是曾經因為建教合作而在公司實習一段時間的人。實習被視為是直接接觸工廠環境、並在實習階段便進行初步的訓練，除此之外，也包括工廠內部工作文化的養成等等，例如對建教合作生教導以應有認真的工作態度、保持良好學習精神，曾經培養過的建教合作生，若是畢業後再到工廠應徵，管理者也有比較高的意願錄取他／她們，這是因為，一方面建教合作生可能在實習階段已經初步瞭解工廠運作模式並習得工廠

---

<sup>39</sup> 這裡強調學校學習，是因為若是在工作現場，受訪者提到的學習，則是以技術性的內容為主，也沒提過讀書的事。

內相關基本技能，而工廠內的管理者也可以根據建教合作生實習時的表現，給予一定的評價：

「我比較贊成的是像德國那樣的做法，德國的高職他們是六個月在學校，六個月在工廠，一直輪流這樣子，要這樣子才會學到東西，學來的東西才可以用。我們那邊收的建教合作生有兩種，大概是這十年才有的，一種是從明志工專來的，他們一次來六個月，我們會安排一個學長帶他們，就有點像師傅這樣，這個比較像實習，通常是要單位裡面開缺才會收；還有一種就是跟高工的建教合作，他們一次才來三個月，三個月太短了，學不到東西，應該要至少六個月比較合適，學的東西比較多。以前我都跟他們講，現在比較不講了，跟他們講說如果人家叫你們做什麼，就要做，叫你掃地的話，就要掃，你掃地用一隻手、一隻手插口袋、用兩隻手，你怎麼作人家都會看。高工是跟高苑合作的，那個（指高工的建教合作生）有的人不太願意收，因為教的時間不夠，而且三個月走了，通常就不會再來，不知道畢業後是去哪裡，有的來了也不是很想學。一般來講我是都會收，可能一個班會分配一兩個，也是叫他們該做的都要跟著做，跟著學。其實有的想學的人，就會想要來我們這邊，我們這裡教得比較認真，會教人家東西，來這邊的都會覺得有學到東西。

其實有來我們這邊建教合作的，如果後來有來應徵的話，我們會比較喜歡錄取，因為該學的可能有學過，至少比人家需要的時間短，而且他這個人做事怎樣，我們都看過了嘛，我們就知道，他適不適合做這個工作。像這樣有來建教合作過，後來有來應徵工作的，然後錄取的，陸陸續續大概有十幾個之多。」（黃樂典）

也因此，若是建教合作生在畢業後再度來到公司應徵，除非是當初在實習期間表現非常差的，否則幾乎都很容易便可被錄取，這除了因為可以縮短訓練的時間外，也是由於已經藉由實習觀察過這個人的「工作態度」，知道這個人不符合公司期待。

對僱用者而言，其實並不太在意需要花時間、精力訓練新進人員，或是在職時因工作所需的進修，而是在意經過公司一定訓練以後的人，是不是會再離開公司而另謀他就。例如在應徵的時候：

「會問應徵的人對未來有沒有什麼規劃，如果說他回答還想要進修、升學的話，我們就會傾向不錄取，因為這樣你就是打算以後還會離開公司，那我們不就是用一個已經知道可能會離開的人，還要花時間去訓練他？不過有的人可能比較倒楣，他可能本來想說，人家這樣問是要看你有没有上進心，所以就回答那種答案，結果反而不是。」（黃樂典）

至於學習內容方面，既然進入公司都需要從頭訓練，因此也不會太在乎高職應該學到多少東西，只要具備「最基本」的概念就好了。例如：

「現在的高職，學的東西太深太難了，有的人他會去念高職，就是因為書念不好、念不來，叫他念那麼深，用也用不到，而且學了也不一定學的起來，學也學不會，到頭來還是沒用。高職應該是要學一些基本的科目就好，這個目的是要讓他有一些基本概念，就好像大學念四年，念的東西去工作現場還是要學，可是因為有基本概念，學起來會比人家快。高職要學的應該是這樣的東西就可以了，我們有遇到說在看工程圖的時候，有個年輕的工人看得懂，人家就問你怎麼看得懂，以前從來不知道他看得懂這個，他就說是在學校有學製圖，像這種就是基本科目，應該要學這種東西。高職的目的就是讓學生畢業以後出來要工作的，當然是可以馬上用到最好。」（黃樂典）

就實務界而言，既然訓練出立即可用的人才在數十年來都未達成，也就不會太在意職業教育必須教授某些能供實務界立即可用的內容了。

## 5.2. 社會上對技術的重視

台灣社會重視技術其來有自，首先在日據時代後期，由於工業化與戰爭的緣故，使殖民地政府雖然對於日本人和台灣人的教育機會上依然不平等，但是卻必須倚重有技術能力的台灣人，有技術能力者，不僅待遇好、升遷機會也比較高（方俊育，2000：32-35）。而「實業學校」（相當於職業學校）的畢業生，不管是在戰前還是戰後，都會慢慢成為地方上的領導人物（蔡明達，1999），就此方面而言，擁有技術者，便能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方俊育，2000：145-146）。

日據時代受到重視而能享有較高社會地位的技術人才，我們可以想見的是，在戰後初期如果沒有經歷太大的變動，應該一樣能享有如此地位。一方面這些人本來就已經佔有了較好的位置，也比較容易繼續維持其地位，另一方面，以當時的社會而言，教育程度相對上普遍較低，就讀到職業學校的人，應當會被視為不容易的一件事。

在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歷程裡，技術的培養，受到國家相當的重視，在社會上同樣是如此。台灣在世界分工體系裡扮演半邊陲的加工基地角色，但有別於南韓等其他扮演相同角色的國家，台灣產業的特色是中小企業林立，有別於南韓大企業、大財閥的方式。眾多中小企業生存、競爭的法門，在謝國雄的研究裡，便是「拼、闖、鑽、學」四個字，其中包含了超長的工時、市場開拓、

靈活度、以及實務技術上的改進、學習等等，謝國雄稱之為「草根性 R&D」（謝國雄，1999），這有別於大企業中有專門研發部門進行研發的方式，而是在實際生產過程中，從各個環節裡竭力找到每一個可以修正、改進的部分。林登立對台灣產業發展史中，技術使用的過程亦有所解釋：

在台灣的產業發展史上，我們看到的是台灣引進、吸收、及追趕已工業化之先進國家之廠商的技術的過程，也就是說，台灣所專精的不是一般所謂的高深或先進技術，各時期的產業關鍵技術，大都在工業化國家之廠商的掌握之中。台灣廠商能自由採用的，大都為標準化或已相當成熟的技術，另外亦能合法地使用經授權取得的新技术。但是台灣廠商所從事的技術活動，似乎不只是技術的學習，他們最主要的技術活動，是將產業相關技術應用到產品的設計上去，而這樣的活動就是所謂的商品化，這應是所謂的台灣經濟奇蹟的主要內容，亦將是台灣往後發展知識經濟最有可能及最重要的一部份。換言之，台灣廠商最可能進行的創新，是有關實務技能方面的。創新活動發生於廠商發現，他在具體化技術於產品之中的實務工作或技巧，有需要或值得改善之問題，而創新活動就是在進行實務技能問題的解決。如此說來，創新是順應技術使用上的需求，而自然的展現。其實強調技術之使用在政府政策及廠商之策略上的意義更大，政策或策略將可能不再打高空，而趨向務實，並拋棄大國及大公司的思考模式。具均衡形勢之破壞效能的創新是可遇不可求，專注於技術使用能力的提昇與累積，就能在實務技能上有所創新，這是台灣最可能做到的技術活動（林登立，2002）。

在第一章曾經提到，李遠哲提議廢除高職的聲音剛起，就有清華大學社會所教授吳泉源撰文表示「廢高職的想法其實只是整個社會鄙視技術、看不見技術的冰山一角」。他認為成熟的加工技術是台灣能在國際分工體系中享有「製造王國」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若是正視技術的重要性，重視台灣在產品製造上能不斷精通的技術能力，那麼我們就應該要重視技職教育的改革，而不是廢除<sup>40</sup>。林志成也認為，

對於一個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國際加工基地」而言，技術能力與創新模式，或許不是展現在「開發新產品」、或「本地自製所有零件」上，反倒可能正是在裝配、加工或仿造（這些時常被輕視，甚至被鄙視的能力）上（林志成，1995：3-4）。

由上述看法可以得知，技術在台灣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我們也常常可以聽到，習得「一技之長」是比文憑來得有用的謀生工具這樣的說

---

<sup>40</sup> 同註四。

法，在技能培養以習得一技之長的過程裡，職業教育常常被認為是重要的一環。雖然根據受訪者經驗的比較，職業教育對技能訓練上的貢獻似乎不盡理想，但由於技術在實務界受到相當重視，象徵「技術人才」的高職生，在實務界還是受到相當程度的重視。但若社會上重「創新」而輕忽技術實用上的價值，則會對技能採取較為貶抑的態度。

### 5.3. 高職生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價值」

在直觀的想法裡，一個人在工作上的能力，應該最能影響到這個人在工作上的錄取、升遷與否，然而事實上，我們很容易發現「學歷」在這之中有極大的影響力。討論「高職生」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價值，似乎便是把「學歷」當成影響價值的重要因素。不管我們贊成或不贊成這樣的作法，類似的事實還是持續在上演著。

#### 5.3.1. 文憑主義 學歷等於技能？

文憑主義在這裡指的是，勞工的雇用、升遷等等，文憑佔了很重要的角色，而重視文憑，實際上的意思是把個人的能力，等同於所取得的文憑。受訪者裡最明顯的例子是邱心儀，她在進入電子工廠擔任作業員時，學歷為國小畢業，工作了兩三年之後，雖然工作能力獲得肯定，可是卻遲遲無法升職，便是因為學歷的因素。在考上五年制職業學校後，才念了一年多就可以升職當班長，此時根本連學位都還沒拿到！

「那時候做了兩三年，薪水都沒有變多，有啦，有是有多一些，就多久給你調一點點，像是年資那種，可是很少。可是我做兩三年算很久了，都沒有給我升，升的話薪水調比較多，那後來就有人跟我講，說我就是因為學歷不夠，我只有國小畢業嘛，當領班要有學歷，所以我就升不上去。我就想說那我要再去唸書，這樣錢升得比較快，我就去補習，準備要考試。之前我們也都自己去補英文，因為工作要用啊，像我們學歷差英文也看不懂，那些做的東西很多都是要看英文的，會看英文的比較佔便宜。要考試也要補啊，不然我們很久沒有唸書了，一定考不到。我一個月一百要補習根本不夠，就要休息的時候加班，加班可以多一半的薪水，就在禮拜天休息的時候加班。

後來我就考上商科，是那種五年制的專科，要念五年，出來等於是高職的學歷。那時候能念這個算是很好的呢，不是很多人在唸的。我是晚上

去上課，白天還要上班，很辛苦的。念了一年他們就給我升班長，雖然我還沒唸完，可是他們覺得我已經算是學歷有比較好了。升了之後一個月就多一千多塊，實在是差很多，而且自己都還不用做，只要在那邊走來走去，看別人做就好。」（邱心儀）

在這個例子裡，雖然學歷跟工作能力不相關，但是非常明顯是以學歷作為升遷的最重要考量。而提高學歷所獲得的「回報」也相當豐厚，不但薪水多了一倍以上，自己的勞動強度也因而降低了。

受訪的工廠管理者黃樂典，提到的是從三十年前進到公司的時候開始，對新進人員的招募，便限定在至少高職畢業；工廠內有一些國中、小畢業的，都是稍早就已經進入公司的：

「我們在應徵的時候，就會限定要高職以上的，高職以下的都不要。我們不要高中生還是國中、國小畢業的。因為念高職的通常出來以後找到工作，就會一直做下去比較多，不會一直想著要再去升學。我剛進去的時候還有一些國中、國小畢業的，那是在我進去以前就在做了，以後就沒有這樣的了。」（黃樂典）

受訪者對於既然都需要從頭訓練的情況下，為什麼一定要以高職學歷作為招募的最低標準，原因在於認為高職學歷的人，通常相較上比較不會還打算要升學，願意在工廠內繼續待下去，因此若是以工廠培訓的角度而言，能任用一個比較不會因為升學而離開工廠的人，顯然比較划算。

### 5.3.2.高職學歷的「市場法則」？

在勞動力市場上，高職生數量的多寡，當然成為高職價值高低的因素之一，這也就是市場上的供需法則。但是，事情並不是只有數量多寡那麼簡單而已，否則學歷只有國小的人數若是相當稀少，豈不是也會很有價值？在第二節曾經提過，由於高職被視為培養技術人才的地方，因此在社會上普遍重視技術的時後，高職教育很容易被視為重要的。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是高職過去在「士大夫」觀念裡曾被視為讀書人的階層。

如同第一世代受訪者曾經提到的，由於升學機會不多，因此當時就讀職業學校，也是相當難得的事情，加上進入職業學校，一樣是透過學科考試，也就會被視為相對上算是比較會唸書的人。當 1950 年代施行單位行業訓練課程，依設計必須裁減土木、化工、礦冶三科時，卻遇到地方人士強烈反對，認為此舉會阻礙子弟升學的需求（方俊育，2000：65）。另外在單位行業訓練推行一段時間後，到了 53 學年度（1964 年），施行單位行業訓練的高工畢業生，就業



率竟然有下降的趨勢（顧柏岩，1966），推測其原因乃是「士大夫觀念」的影響，亦即當時的高職生，會將自己定位為「讀書人」的角色；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高農畢業生身上（方俊育，2000：74-76）。也就是說，當時的高職，有一部份的意義在於能提供一個升學管道，同時能就讀高職的人，也算是頗會唸書的角色了。

在第一世代的受訪者中，林靜怡在這方面是一個最突出的例子，她並不覺得自己念高職程度有比別人差，而在敘述過程當中，也有接近於上述「讀書人」的味道：

「畢業以後我就上班一年，一邊補習，我只有補英文、數學兩科，在建國補習班。考聯考的時候因為以後就業的考量，就報名商科的，結果沒有考上，可是以我當年的成績，如果報考文組的話，是可以錄取的，所以我那時候的程度也不錯。

我在 61 年左右，回去開明的電腦教室當助教，就教人家怎麼用打卡，待了兩三年，那段時間最清閒了，看了好多中外文學名著，像齊瓦哥醫生、但丁神曲、史記、離騷、林雨堂全集、瓊瑤的，好多好多都在那時候看的，有的我有點想不起來。坐公車的時候還認識一個在世新大學教國文的老師，成了忘年之交，那時候他已經七十幾歲了，我才二十歲，他也住在新店，我們常常坐到同一班公車。我們一老一少什麼文學的東西都聊，我還去書店買書，自己學填詞，我們就在那邊填詞。我如果再重念的話，我想我一定去念文學的。你看像我讀的這些書，別人還不一定看，我從來不會覺得念高職矮人一等，都是社會給高職的人加上 mark，社會上也還都以學歷決定升遷，可是其實那跟工作能力沒什麼關係。」（林靜怡）

就訪談內容而言，林靜怡提到不比人家（指的是普通高中升大學的人）差的理由有兩個部分，一個是大學聯考的表現，另一個是閱讀大量的中外文學名著，程度並足以和大學國文系教師「以文會友」，成了「忘年之交」。這其實就表示了，雖然目前社會上似乎大都認為高職教育不如普通教育，但是在當年的時空環境裡，能就讀高職的確不是件容易的事（這也是林靜怡反覆提及的），因此她並不會因為就讀高職而覺得不如人，並且用自己在大學聯考以及其他方面（這方面即使是當年就讀大學的人，也很少從事的）的表現，來描述自己的不比人家差。

前面提到不能單純因為數量少就認定高職生在勞動力市場上會有價值，而必須在上述情況之下，高職生的「稀少性」才會被突顯出來。根據第一世代受訪者的印象，當時能就讀高職的人並不多，以國小同學能繼續升學的比例而言，大約百分之十幾左右。事實上在更早的時候，就讀高職的人更為稀少，在義務教育只有六年的時候，加上職業學校數量不多，便會使得高職學歷在勞動力

市場上較有價值。然而在 1970 年代開始，政策上決定大量增設高職，使高職生數量大幅增加，高職生原本的「稀少性」便不復存在（請參見下表）。這是兩個世代高職生予人不同印象的另一個原因。

表七：1955-1990 學生佔總人口千分比：按各級學校分

《資料來源：教育部網站<sup>41</sup>》

學年度	總 計	幼稚生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高級中學	職業學校
1956	177.71	5.75	142.57	18.83	3.95	4.42
1961	226.64	6.99	178.46	26.92	5.73	5.38
1966	249.02	6.25	176.97	39.54	10.14	7.70
1971	274.04	6.68	163.10	58.66	13.38	17.47
1976	270.15	7.32	141.32	66.43	11.62	25.39
1981	258.64	12.22	122.22	55.69	10.84	32.82
1986	258.36	11.41	112.37	58.33	10.97	32.94
1991	241.17	10.96	90.99	53.22	12.72	33.50

此外在 1970 年代高職的大量設立，是透過鼓勵私人興學來達成，然而根據謝小芩等人的研究，教育部門長期「重高中、輕高職」，加上技職教育體系內又重公立、輕私立，使得資源分配不公。以經費補助而言，教育部門對私立高職補助遠低於公立，「私校生繳納相當於公校生五、六倍的學雜費，只受到三分之一成本的教育品質」（謝小芩等，1996：60），而教育部門又限制學雜費上限，在經費來源不足下，使得私立學校即使有心也難以施展身手。對於師資培養上，不像普通高中長期都有相對應科目的教師培育，高職教師的培育管道相對上不足，對於技術教師的培育也沒有明確規定，甚至在「師資培育法」裡也一樣沒有規定。課程方面同樣有許多問題，課程修訂間隔過長，課程內容不符合學生學習狀況（謝小芩等，1996）。在私立高職大量設立之後，由於前述種種不利條件，使高職、尤其是私立高職辦學情形不若以往，其中條件更為不利的私立高職，為數還較公立高職來得多，這些也都使得高職予人的印象，較過去要來得差。

<sup>41</sup> <http://www2.edu.tw/statistics/user1/index03.xls>。

### 5.3.3.高職生的升學機會

關於職業學校學生升學的現象，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顧柏岩（1962）便曾提到，當時「一般青年多以投考普通中學為第一志願，以便將來投考大學」。進入職業學校的，除了特殊原因以外者，多為投考普通中學落榜者。先前曾經提到，受訪者對進入高職就讀的原因，最常提到的，就是：因為考不上高中，在兩個世代之間均有此現象。第二個世代裡，五專的「排名」則又在高職之前，形成高中 五專 高職的排序<sup>42</sup>。擔任高職教師二十多年的許書文，提到過去就讀高職者，是僅次於高中的第二流學生，但到了現在，高職、尤其是私立高職，招收的在學業上已經被認為是第五流的學生了：

「如果要我比較以前跟現在的學生，我會覺得以前的學生比較認真，素質比較好，以前算起來，念高職的是第二流的學生，只比念高中的差一點，可是現在不是，現在可能第一流的去念公立高中，第二流念私立的，第三流念五專，念到高職都四五流了。那公立跟私立又有差，公立高工就會以升學為主，百分之九十都升學了，私立的就比較沒有優勢，可是還是會跟著潮流啦（意指以升學為導向）。」（許書文）

對於升學的考量，這些受訪者所呈現的，由於台灣的教育制度幾乎完全以聯考方式作為升學的依據，而聯考主要的依據在於「智育」的成績，因此一般在決定的時候，不得不接受以聯考 智育成績做為自己決定的根據。雖然這其中許書文認為自己並不適合就讀高中、升大學，因此決定進入高職，似乎有別於直接接受聯考的篩選，但這其實可以說是，覺得大學距離自己「太遙遠」了，因此沒想過可以念大學。

第四章曾經提到高職生的升學現象，並發現雖然一般認為現今高職升學導向的現象嚴重，並因此質疑如果高職生大都以升學為目標，而非畢業後投入勞動力市場，那麼是否繼續維持高職的制度令人懷疑，但其實在第一世代受訪者經驗裡，也可以看到升學的現象。而受訪者升學的原因，同樣都是希望藉由較高的學歷，謀求更理想的工作。也就是如同前一小節述及以文憑作為能力的象徵，並因此決定雇用、升遷等等，不論其因果關係為何，都會影響人們在有機會的時候試圖謀求更高的學歷。

---

<sup>42</sup> 有位現年四十歲出頭的朋友，曾提過自己在 1970 年代國中畢業面臨升學的選擇時，當時對於五專的印象並不好，認為那是很容易學壞的學校，因此她的選擇是進入私立高職。根據張一蕃的說法，專科的大量設立是在 1960 年代，然而學校的增設以私立居多，水準參差不齊，因而自 1971 年政府開始限制專科成立，並在 1975 年開始辦理專科學校的評鑑，整頓專科學校（張一蕃，1996：1）。

前面曾經提到過，兩個世代的受訪者，提到在學校的學習情形時，往往會提到「沒什麼在唸書」，這個答案把學習偏重在知識的部分，因而很明顯地聯考制度會是造成學習偏重知識的原因之一，因為絕大多數的入學考試都偏重或者只評量「智育」學習的情形，也就是升學的方式，影響到人們容易把學校的學習偏重在有沒有唸書。

另一種比較高職生價值的方式，是高職在教育體系內的相對位置。有別於 1970 年代將高職定位在培養基礎技術人才的層次，在 1950 年代初期，高職的教育目標為培養中級技術人才（顧柏岩，1962），這是相對於當時的初職而設定的目標，當時初職的教育目標則為培養基層技術人才。再把高職學歷和義務教育做比較，在九年國教實施之前，高職相較於國小，等於是比每個人的基本學歷「高兩級」的教育程度，在 1968 年九年國教實施之後，高職則只比基本學歷高一級，高職和義務教育相對上的距離便拉近了。此外，亦可和教育體系內的其他學制比較，戰後初期一直到 1960 年代，職業教育體系內，只有唯一一所台北工專的學歷較高職來的高，後來除設立高雄工專外，並開放私立專科學校設立；1975 年更高等的台灣工業技術學院也成立，近十年來教育部更是大加鼓勵專科與技術學院的升格、設立，凡此種種都會相對地使高職的地位降低。



## 第6章 結論

近年來對於高職教育有許多研究、討論，並有許多政策的改革，例如針對長年高職與高中學生七比三的比例，應當隨著時代變遷而修正；修改實施數十年的單位行業課程概念，引進群集課程；試辦、實施學年學分制、高職社區化、綜合高中等等。若是以高職「培養基層技術人才」的目的來看，高職政策的改變，應當是認為高職在某種程度上並未達到其目的，或有缺失，因此必須做出修正。對於高職的這個目的，我們應當要問的，現在既然需要修正，那高職在過去是否真的就達到了培養基層技術人才的目的，是不是現在的高職生，在技術層面上，不如過去的高職生。

### 6.1. 研究結果

根據兩個世代高職生的求學以及就業經驗分析，可以得到下列結果：

#### 一、從高職生的經驗看是否感受到世代差距

兩個世代相較，第一世代受訪者就讀高職的原因，有因為考不上高中、有因為自己認為不合適念高中、也有因為升職所需，在當時他／她們的國小同學大約只有百分之十到二十升學的情形下，就讀高職雖然似乎仍比不上就讀高中、升大學，但已經算是很不錯的學歷，相對上也是「會唸書的人」。第二世代高職的選擇幾乎都是排在高中、五專之後，雖然同樣因為考不上高中而就讀高職，但是因為高職生的數目已經大量膨脹，加上升學管道愈來愈多，造成在國中畢業後繼續升學的人裡面，高職就幾乎變成基本學歷，因此高職生也不像過去一般被視為「讀冊人」，反而因為曾經聯考失利，而被認為是不適合唸書的人。也因此，兩個世代高職生明顯感受到同樣是高職學歷，卻在社會上有不同的價值。

#### 二、差距是否為高職生技能不足所造成？

以「培養基層技術人才」為宗旨的高職教育，碰上不同世代高職生對於高職的學歷有不同的感受，最直接而常見的理由推測，就是「現在高職生學到的技能比過去的要來得差」，因而造成高職生地位的下降。然而根據高職生就業經驗的比較，兩個世代間的高職生在學校所訓練的技能，在工作現場上均有所不足，仍都需要一定時間以上的訓練，才能應付工作所需。工廠管理者也表示，三十年來招募進工廠的高職生，無論其本來背景為何，一律都是從基本訓練起，這是因為工廠機器和學校有很大的差距，不同工廠之間又使用了不同的機

器，除了曾經透過建教合作進過工廠的，可以部分減少訓練時間外，絕大多數仍然是從頭學起。

造成「所學技能不夠用」的現象，除了客觀上技能有可能的確不足外，還包括是否從事和高職所學相關的工作。若是從事非相關工作，自然會覺得學校所學較用不上。兩代受訪者中有多位都曾經歷不同工作的轉換，也曾從事過不相關的工作，工作轉換主要的原因在於現實上並無法期待一定能找到和學校所學相關的工作，或是多次嘗試才有辦法找到令人滿意的工作。從事非相關工作的情形，也會讓受訪者覺得，學校所學在出了社會之後，似乎一點用處都沒有。

除此之外，對於高職階段求學情形的印象，也會影響高職生認為自己「學了多少」，並進而影響對「高職生技能」的看法。多位受訪者都會提到就讀高職期間「沒學什麼」、「都在玩」、「都沒在唸書」、「功課壓力輕」這樣的談法，無論這些說法能否充分代表受訪者「有沒有學到東西」，這些談法都容易使「高職生沒學什麼、都在玩」的印象出現，影響對高職生技能的看法。

### 三、高職生技能之社會地位

此部分談到社會面向的因素，這也會對高職生技能之印象產生相當的影響。第一世代高職生較為受人看重，部分原因其實是由於當時升學不易，高職在教育體系內相對上屬於中高學歷，而且數量稀少，到了第二世代就讀時高職已大量增設，且不論普通、技職教育體系升學管道均大為增加，使得高職生在相對上的地位降低不少。

再把技能和經濟環境連結來看，有別於當下對於「技術創新」之重要性的強調，過去台灣經濟的發展，相當有賴於生產時在技術使用過程中，對實務技能的改進與學習，不斷精通、增進生產技術，以維持台灣在世界分工體系中加工基地的角色。這也使得象徵「技術人才」的高職生，縱使技能常常是在現場中學習，而非學校，但高職生在實務界還是受到相當程度的重視，連帶地會提升高職生技能的地位。然則若是社會上強調「創新」而忽略實務技術，將會對技能採取較為貶抑的看法。

因此，若是要談論到高職生技術能力的高低，除了在客觀的技術能力上進行詳細分析比較以外，社會上面向的影響因素同樣會影響到人們怎麼認知高職生的技術能力。根據本論文，兩個世代間的高職生在就業之後都產生了技能不足的情形，第一世代並未顯示出有明顯較為足夠的技能。然而，由於技能的社會面向之因素，會使得高職生仍被認為是具備技術能力的人才。

## 6.2. 高職教育之我見

要探討高職教育，應當不能忽略的，是高職教育的目的，此目的在前面曾多次提及，並曾提到，若是根據這個目的來看，數十年來高職教育的成效，頗值得令人懷疑。就職業教育而言，高職教育應當是其中的一環，過去六年國教的時候，「初職」被視為基礎職業教育，高職則是中階職業教育；在九年國教之後，初職廢除，高職便成為職業教育中的基礎階段。也就是說，高職教育在職業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於其相對位置。然而根據繼續升學專科、技術學院的受訪者的經驗，在高職、專科及技術學院階段的職業教育內容，以同一科別而言，不同層次的受教階段，在課程內容上並未有太大的差異，無論是科目、教材難度上沒有明顯層次劃分，雖然會加入新的發現或理論，但受訪者提到最大的差異，往往只是在於原文書的使用，並因為英文能力不佳，使得學習上仍是相當仰賴中文書籍，然而實際內容上的差異並不覺得太大。對於職業教育中不同階段的學習內容，除了受訪者陳述外，若要更進一步比較，或許需要針對教材內容實際探討。然而就普通教育而言，我們大概不會聽到，一個接受普通教育的人，認為不同階段的課程內容程度都差不多，光是課程設計就可能對於高職生的學習成果造成很大的營想。

再回到目的來談，在提到教育「有沒有用」的時候，一般的想法會認為就要看就讀的科系和所從事工作的關係。然而，有別於教育體制內的其他學歷，高職畢業生被認為應該是「立即可用」、幾近「一個蘿蔔一個坑」才算符合要求。如果高職教育的目的為此，那最好的課程設計方式，必然是強調建教合作的作法，讓高職生在畢業後就進到當初的實習單位，如此最能符合這種要求。要從事高職教育的改革，必須一問再問的，就是高職教育的目的究竟為何。如果目的是培養技術人才，但實際上達到的程度有限，那以此為目的的高職，的確失去存在上的必要性。然而，若是把高職教育視為教育體制內的一環，去除跟經濟發展掛勾的想法，把高職教育回歸成教育的一種方式，則高職教育有其他存在的價值。

台灣的教育制度免不了是參照許多「先進」國家之經驗而制訂，然而在參考的同時，必須注意到每個國家都有其特殊性。以高職教育而言，「先進」國家裡，存在著極為重視職業教育的德國，以及幾乎完全偏重普通教育的法國，其他國家也都有在他們歷史背景下所產生的職業教育制度。若是有人想把職業教育（或更廣泛的教育制度）和某個國家的發展程度作連結，應該要小心注意教育所扮演的，是否為傳統現代化理論所認為如此重要的角色。此外，高職教育也是職業教育、乃至於整個教育制度的一環，並非是單獨的存在，對於高職教育的思考，除了應該回顧、確立其目的外，也應該從整體教育理念的層面來

思考，而不是將一個個看似「有趣」的觀念，硬生生地就從國外搬到台灣來施行。應該也考慮到，台灣未來教育的大方向為何；十年教改有其正面作用的部分，然而對於教育大方向整體性的思考，在教育部長一個個更替的過程中，卻還看不到一個一貫而整體的思考，因此才會造成改革似乎是「東拼西湊」而成的。教育的大方向，並不是本篇論文所要提出的，然而應該有此整體思考，再來確立職業教育、高職教育的目的及方向，方能避免某些政策上過於快速的變化，令人無所適從。

## 6.3. 研究中的其他發現

### 一、實務界對技能的「最低要求」

對於高職生進入工作現場後，所學技能並不足以使用的現象，雖然對受訪的工廠管理者而言，招募的員工可以立即發揮生產力，應當是最理想的，但是既然現實上不是如此，企業也會有自己因應的辦法，也就是自己訓練新進的員工。就這角度而言，受訪者反而希望高職只需要做到基本概念的培養即可，其餘的就交給企業自行培養。

### 二、「過多」的升學機會造成人人都想升學？

有受訪者曾表示，現在高職畢業可以升學的機會比過去多很多，甚至有的學校在經費不足的情形下，為了招攬學生，慢慢出現部分「只要報名就可以錄取」的現象，也使受訪者認為，「大可以去嘗試看看」。原本升學機會增加是為了減少升學壓力，增加機會讓想升學的人不用擠破頭去搶少數的名額，但是在升學機會增加以後，反而也造成有更多的人想要升學，原本希望增加機會可以減少升學壓力的作法，在另一方面造成想升學的人數增加的趨勢，同樣的現象也可以在大學上看到，對於習慣以增加學校容量來解決升學壓力的方式來思考的人而言，這個現象或許值得我們警惕。

### 三、後續研究建議

本論文對於技能的看法，認為技能除了客觀可具體化的部分外，社會面向的因素也是技能組成的一部份。換言之，當我們要描述高職生所具備之技能時，除了試圖從具體技能來評判高職生的技能是在何處習得之外，也要注意諸如高職學歷的價值、以及社會上對技術重視程度，都會影響到人們怎麼看待高職生的技能。

在客觀技能的部分，本論文的目的是在透過高職生之求學、就業經驗，驗證兩個世代間高職所訓練的技能是否明顯足以在工作現場上使用，因此重點在



於夠或不夠及程度的大略描述，然而若是要細問究竟在工作現場上，高職生的技能是如何發揮作用，又是如何和工作現場互動學習，以及比較出現場和學校的差異，則或許可待未來進一步的研究。

## 參考書目

方俊育

- 2000 《技術或政治-台灣戰後工業職業教育發展史（1945-1986）》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王自和

- 1982 《費新博士與我國工業職業教育發展之研究》，台北：政治大學教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1986 民國五十年代後中德工職教育合作的回顧與前瞻，見中國比較教育學會世界技術職業主編《世界技術職業教育改革動向》，頁：133-158。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安後暉

- 1998 《美援對台灣職業教育的影響,民國三十九-五十四年》，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

羊憶蓉、吳惠林

- 1996 《分流教育與經濟發展：政策分析與實際效果》，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出版。

行政院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人力發展工作小組

- 1970 《西德職教專家對我國職業教育之改進建議書》，台北：經合會。

林文瑛、王震武

- 1996 《分流教育的社會效果分析》，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出版。

林志成

- 1996 《技術的依賴或依賴的技術：台灣產業技術形成初探-以工具機產業為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所碩士論文。

邱兆偉

- 1975 我國職業教育現況的檢討與改進建議，見《教育溝通研究》47-98，台北：商務印書館。
- 1981 我國台灣地區技術及職業教育之檢討，見《台灣教育》：372。

施溪泉

- 1990 從人力資源應用論高職新課程之類科設計 ，《第五屆全國技術及職業教育研討會論文集》 ，頁 9027-9032。

紀經峰

- 1986 從中德技職教育之比較論我國工職教育之改革動向 ，見中國比較教育學會世界技術職業主編《世界技術職業教育改革動向》 ，頁：159-250。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馬道行

- 1986 我國技術職業教育發展問題與改革動向 ，見中國比較教育學會世界技術職業主編《世界技術職業教育改革動向》 ，頁：271-294。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康自立等

- 1988 《職業教育輪調式建教合作教育評鑑之研究》 ，教育部技職司委託研究報告。

張一蕃

- 1996 《專科及高等技職教育》 ，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出版

張良德

- 1980 《我國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實驗階梯式建教合作成效評估與改進之意見》 ，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研教所碩士論文。

張波鋒

- 1988 《職業訓練》 ，台北：黎明出版社。

張清溪

- 1994 教育與人力規劃 ，「全國民間教改會議」（1月8-9日）

莊謙本

- 1980 《我國工職教育界對高工階段實施職業群集課程可行性之意見調查研究》 ，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研教所碩士論文。

黃俊傑、吳展良、陳昭瑛

- 1996 《分流教育的改革：理論、實務與對策》 ，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出版。

黃麒麟

- 1980 《我國工業界對高工階段實施群集教育可行性意見之調查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研教所碩士論文。

劉仲冬

- 1996 民族誌研究法及其實例，見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頁 173-194。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歐素瑛

- 1997 《光復初期台灣職業教育之研究,1945~1949》，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蔡明達

- 1999 《日據時期台灣的實業學校與社會流動》，桃園：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謝小苓、張晉芬、黃淑玲

- 1996 《技職教育政策與職業學校的運作》，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出版。

謝國雄

- 1989 《黑手變頭家：台灣製造業中的階級流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2:11-54。  
1999 《純勞動：台灣勞動體制緒論》，台北市：中研院社研所籌備處。

鎮天錫等著

- 1987 《人力政策之形成與實施》，行政院經建會編印：16

顧柏岩

- 1958 「工業職業教育的檢討與改進」讀後，〈《工業教育月刊》2:2。  
1962 我國職業教育實施現況及其問題，見中國教育學會主編 職業教育研究，頁 25-38。台北：正中書局。  
1966a 台灣工業教育的幾個問題，〈《工業教育月刊》4:9。  
1966b 如何促進我國工業職業教育的實施—工業教育準則的擬議，〈《工業教育月刊》16:6

Mays, Arthur B.

1970 《職業教育的原理與實際》, (任永溫譯) (1982), 台北: 正中書局。

Chen, H.

1999 *MAN, MACHINE AND THE GODS: Skill, Hegemony and Culture in the Making of Taiwanese Machinists*. New York: 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Press